

# 第一章 建寺文化的由来

## ○建筑是五明之一

佛寺文化是由教徒们的宗教情怀，历经数千年才交织而成的，早已经是亚洲文化的主要骨干。在二十世纪以前，亚洲约计有数十亿人口的国家或地区，都曾溶浸在佛教的文化里。虽然目前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仅占现今全世界总人口数六十余亿的 5.5% 左右，而且许多原来信仰佛教的地区，都已改信其他的宗教，但是在在处处仍然可以找到佛教文化的影子。

建筑是文明的产物，建筑物本身就是大型而且耐久的艺术品，文化、艺术古品如果没有建筑物的庇护，是很难保存至今的。今天谈《建寺文化的迷失与觉醒》不应该只谈「佛寺建筑 (Buddhist temple and building)」。由于佛寺有很深的宗教与社会属性，它是同一时代的“文化载体”，涵括了哲学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商业贸易、伦理道德、人文风尚、慈善救济、碑铭书法、建筑工艺、园林环境、美术创作、雕塑艺术、壁面彩绘、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服装佩饰、法事仪轨等等。

所以，要从历史资料谈佛教与建筑演变的关系，更要谈佛法 (Buddhism) 与建筑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的目的，以及政教相互间利用的关系。更要谈及生活上居住的需要与佛法相融之处，谈及呈现在建筑上的佛教艺术文化如雕塑、彩绘等等。所以，笔者就以身为建筑师 (architect) 及密宗传法阿阇黎 (Acarya, 教授师) 的立场，来谈三十年来从信仰佛法中对于佛教与建筑文化的感想。

建筑设计 (architecture design) 及其营造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可以归属于佛法所说的「五明」中之「工巧明」(Silpakarmasthana-vidya)。《瑜伽师地论》(The Yogacarabhumi) 卷三曰：「一切世间工巧业处，名“工巧明”论。」“工巧明”就是明一切工艺、技术、算历等知识，建筑乃营造工艺是也。《菩萨地持经》卷三曰：「明处者有五种，一者“内明”（以三藏十二部经教为主）处，二者“因明”（考定正邪、真伪之论理学）处，三者“声明”（语言、文学等学术）处，四者“医方明”（医药学）处，五者“工业明”处，此五种明处，菩萨悉求。」此西域内外学者必宜学习之处，归类有“五明”，故说“五明处”。

本书主要是介绍佛教的建寺文化，将介绍佛塔 (pagoda)、僧院 (monastery)、石窟 (cave)、佛殿 (temple) 等兴建的历史缘起，以及佛像创造的缘起与发展。并不会很详细介绍佛寺建筑物及其艺术品的细节，因为这类的文章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

## ○原始佛教初期没有「佛寺建筑」

多年前，内政部曾发文要求建筑师公会对所谓的「佛寺建筑」，作一个明确的定义。必是想要把佛、道、耶、回、儒各教，可以从建筑形式上，一目了然地看出其不同来。其

实，大部分的“汉传佛教”建筑，就是一般的中国建筑，与平常的宫殿或住宅建筑，本来就是同一样式的。所以，建筑师公会认为没有必要界定哪一种建筑才是「佛寺建筑」。两岸交流以后，许多国小学童跟着祖父母回大陆的老家拜访，他们说都被大人带着到处去看庙，因为中国古建筑看起来就像庙宇。

尤其在中国云南地区，更可以见到印度、西藏、汉地、南传四种佛教的混合建筑形式，交融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雕刻艺术风格，根本无法确定何种建筑才是「佛教建筑」，因为它们都是「佛教建筑」之一。

因为，早期佛陀带领“沙门”（Sramana，乞士）僧众游方，行乞于四方，生活要求极为简便，「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常栖息于树下、山洞或露地修习禅定，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后来所谓的「佛寺建筑」。酷热时或雨季也仅短暂借住民间房舍，如果是“头陀”（Dhuta）行中，“阿兰若”处（Aranya，也称“阿练若”、“兰若”，意为丛林处、远离处、空家）更要远离人家，在树下、露地、冢间、草地随坐，且常坐不卧，根本不需要「佛寺建筑」。

中国汉代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处悉称为“精舍”。天竺（Hindu、Sindu，古印度、身毒）最早的佛教徒修行处所“委奴婆那”（venuvana，园林）当时翻译成中文也利用“精舍”两字，这种场所是印度雨季时期安居的共用道场。《学林新编》曰：「晋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静舍”于殿门。引沙门居之。因此俗谓佛寺曰“静舍”，亦曰“精舍”。」故《慧苑音义上》曰：「艺文类曰，“精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曰“精舍”，由其精练行者之所居，故谓之“精舍”也。」

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就说：「自佛般涅槃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犍。（以）铁卷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

早先摩揭陀国（Magadha，国域大致包括今印度比哈尔邦 Patna 和 Gaya 地区。）国都王舍城（Rajgir）的迦兰陀（Karanda）长者皈依了佛陀之后，为了奉佛而献出在王舍城之旁的竹园土地，又经频婆沙罗王（Binbisara）建立「如王住殿」般的大讲堂及房舍，故称名为“竹林精舍”（Karanda venuvana vihara），是为天竺五精舍之一。其他为：舍卫城富商给孤独长者（Anathapindika）所献在舍卫国的“给孤独园精舍”（Jetavana vihara，又称“逝多林”）；在摩揭陀国的“鹞岭精舍”；在毗耶离国的“猕猴池精舍”；在毗耶离国的“庵罗树园精舍”（Amrapali vihara），后来合称为“天竺五山”。这是经典记载天竺僧园建设的开始，都只是一个雨夏时讲法、休息的馆舍，还称不上是后来我们习称的“寺院”。

#### ○各种不同的佛教修行场所

本来“原始佛教”主张出离世间，甚至厌恶人生，常行“头陀”行，等于是过着「随

处皆安」的生活，并不需要固定的居处。到后来才形成的「四方僧的住处」，由梵文译成中文为「招提僧坊」。

“僧”是僧伽（sangha）的简称，是复数，意为“和合众”，要有三或四人以上之比丘或菩萨和合才能称为“众”，是指出家或在家修行团体的意思。指的是佛教的修行团体，若一个人自称“贫僧”，不管是在家或出家众，那是错误的。但其梵音（Caturdesa-samgharamag）音译应是「佳拓斗提舍——僧伽蓝」，佳拓斗（catur）是四，提舍（desa）是场所、方、国土，即四方僧众共住的场所。“佳拓斗”被写为「招」字，是把「拓」字误看成「招」字的结果。

唐贤首和尚弟子慧苑所著《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中写道：「僧伽蓝，具云僧伽罗摩。言僧者，众也。伽罗摩者，园也。或云，众所乐住处也。」《慧琳音义》卷二十六曰：「招提僧坊。此云四方僧坊也。」《名义集》卷七曰：「后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蓝，创立“招提”之名。」不过，可能是念习惯了，如果将“招提寺”念成“拓提寺”，反而觉得奇怪了。

中国的皇帝通常都是武人出身，识字水准有限，而且拥有「颁名赐号」的权威，急思汉化的胡人皇帝金口若将“拓提”读成“招提”，百官仍然欢呼圣上睿智英明，谁敢纠正？尤其弄错一个字，可能还有欺君之罪，要遭杀头的。因此我们也看到对西域诸国地名，亦常随着汉人帝王之喜恶，任意将音译之名加以修改或简称，或对许多来朝贡的国家都给取了虫字旁的名称，如蠕蠕，或以动物称犬戎，或称胡夷等。

又因为科举盛行词赋写作，中国士人即常作简称之举，如阿弥陀佛（Ami tabhah Buddha）简称为“弥陀”，阿罗汉（Arhat）简称为“罗汉”。时至今日，如「因家禽感染导致在人类所产生的流行性感冒症状」，就以“禽流感”一辞带过。

又有梵音“毗诃罗”（Vihara），中土之意是“游行处”，为僧人所游履处也，在锡兰则是对寺庙的称法，所以指的也是“精舍”、“僧坊”、“住处”。《大日经》疏三曰：「僧坊梵音“毗诃罗”，译为“经处”，即是长福住处也。白衣为长福故，为诸比丘造房，令持戒禅慧者得庇御风寒、暑湿种种不饶益事，安心行道。」可见不知何时开始，天竺“僧团”（sangha，僧伽）的行乞被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区域内的僧伽又被分割为较小的教区，而固定住于一个地方。本来是四方僧伽共用的“僧院”就转变成固定僧团的“僧院”。

佛教初来，汉地以为佛教的斋戒就像当时传统的地方（山神）祭祀（sacrifice），所以将僧侣斋戒的处所，也笼统地称为（嗣）“祠”，而有“仁祠”一词出现在僧传中。《晋书》卷九十五载王度上石虎（后越太祖，西元334-349年在位）奏章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故知“寺”在当时属祠奉祭祀佛像之场所。

据说佛陀临入涅槃时，有一位弟子问到，以后如何纪念佛陀和教法，佛陀回答只要一堆土能够存放舍利罗（sarira）即可，并没有修筑建筑物。故知后来天竺佛寺是以“塔”

为中心，只是为了能存藏佛陀的舍利而已。天竺称佛塔为“浮图塔”（Buddha's Stupa, Budo Stupa），人们便简称以“浮图”、“佛图”或“浮屠”，作为僧侣斋所的称呼。

于中国石赵时来华的高僧佛图澄，曾在一座五层浮图上的金露盘题铭指出：「树德劝化，兴立神庙」，可知当时“浮图”被视为“神庙”，视佛为变化不死的神人，以神祠祀佛。后来“寺”或“寺院”成为佛教道场的通称，与传统之祭祠分开，连“伽蓝”、“浮图”的名称就比较少或不再使用了。

自古中国便有了“丛林”制度，得以自食其力，让僧众无忧虑的修行。传说顺治皇帝的“出家诗”就提到：「天下丛林饭似山。」“丛”者，众也；“林”者，聚也。“丛林”是僧众聚集处的意思，所以也有以“禅林”、“檀林”、“僧林”作为佛寺的他称，可以归为「山林型」的佛寺。

### ○无法定义什么是「佛教建筑」

早期古天竺佛教寺院的建筑型制（form、type）曾传来西域及中土，其主体的型制是四方形的「宫塔式」。《魏书·释老志》写：「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佛图”每层壁面布满佛龕，象征“天宫千佛”，中土便以「宫塔」称之。如米兰古寺遗址、龟兹雀离大寺、阿奢里贰大寺遗址、晋代高昌西克普古寺遗址、唐代于阗丹丹乌里克小寺、东汉洛阳的白马寺、曹魏洛阳宫西寺，主体都是四方「宫塔式」。而汉至唐时代西域地区的佛寺，则以「宫塔式」的型制为主流；汉地则经「华梵融变、化梵为华」建筑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寺。

天竺「宫塔式」的建筑是传统的砖石结构，在遇到中土传统的木石（砖）结构时即被融合，导致寺塔的化新，也形成不同的行事。首先是演变成「楼塔式」的佛寺，楼塔内供奉佛像，取代了在宫塔外部的千层佛龕，使诸佛、菩萨走下梵宫，进入宽敞的殿堂；于楼塔内的诵经行事也取代了绕塔瞻礼。

汉末的徐州浮图寺、前凉姑臧的宏藏寺、东晋的宣城寺、拓跋魏平城五级大寺及永宁寺等，其主体都是「楼塔式」。到了三国至南北朝时代，以「楼塔式」为主体的佛寺遍立南北各地。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徐州浮图寺是中国建寺之始，此寺楼塔相轮高耸、体量巍峨、结构繁复，为相当成熟的中土木石构造建筑。

传统的木石（砖）结构更进一步的纯化，导致成「廊院式」的佛寺出现，这种型制可以是一个院落，也可以是多院组群；殿塔、楼阁、亭台、池沼等的任意组合；寺中佛塔的位置或前或后，或竟归于佛殿中，或上了大殿屋脊中间，或消失了，或缩小进入建筑物中。「廊院式」的佛寺盛行后，以佛塔为中心的一元主体建筑，就演变为以佛殿为中心之多元化主体建筑群。使得汉唐盛世的佛寺型制与布局异彩纷呈，营造出中土独特的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汉土的初期，只是众僧房（一般民居）中间围着一座佛塔（主要建物），并采用非建筑结构的某些文物雕绘品附加、摆饰于屋内，建筑物没有大不同于现今所知的中国式的建筑。近年来，谈到汉（北）传佛教建筑，也仅仅是谈现代化的、仿中国式的宫殿加院落建筑群而已，并未提出古代南北丝路（Silk road）上或吐蕃西藏（Tibet）、天竺（Thindu）印度（Indu, Hindu）、泰傣（Thailand）、缅甸（Myanmar）等地的佛教建筑型制的研究。

如今，交通发达，显密佛教（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相互交流更加迅速，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近年也盛行于台湾。由于台湾信众的虔诚，台湾就建造了各式（国）各样的佛教建筑，也都是属于佛教。

不像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 Catholicism、新教 Prtestantism、路德教 Lutheranism 等，目前信仰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或伊斯兰教（Islam，目前信仰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的建筑，他们的型制比较统一，眼见即知。因此，在漫长历史资料中，世界各地佛寺经过各国文化的洗礼，产生那么繁杂的演进，加上各国不同的型制，更难正确定义出什么才是「佛教建筑」了。

#### ○修行场所的名称

古代印度佛教徒聚会修行的地方——斋戒场所，中土简称为“伽蓝”，是梵音“僧伽罗磨”（Sanghar amag）及“僧伽蓝”的简称。“僧伽蓝”意为修行僧众之「静园」。直到阿育王时开始建佛陀舍利塔，僧院就以“塔”为中心围绕。早期中土佛寺也多以“佛塔”（stupa）为中心，旁配以民居。

后来才是以兼有宣政作用的「寺」为佛教建筑的名称。寺者，《释名》曰：「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寺”在周代为内廷官署，西域僧人来华，先住在官署寺里，后来虽另居他处，不忘其本，故而继续沿用。或是作为礼拜（祖先）的场所。《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秋九月「识知寺舍」下注引《风俗通》云：「寺，司也。诸官府止，皆曰寺。」

#### ○佛教传来汉地

史书曾记载佛教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 2 年），就传入中国内地。《后汉书·西域传》及《魏书·释老志》则记载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元 67 年），中印度月氏国僧迦摄（叶）摩腾（Kasyapa Matanga）与竺法兰（Dharmarakcha）随同西行求法的使者郎中蔡愔等人入华，携来在中亚编纂的佛陀嘉言录《四十二章经》（The Sutra of 42 Sections），他们再随同行的博士弟子秦景（但也有景卢、秦景宪、景匿、景虑的不同说法）等人返回洛阳。

永平十一年，竺法兰（Dharma-ratna）译《佛本行经》五卷为汉译佛经与佛教北传之

始，亦是首创中国汉译佛经、佛教国家事业、佛教政教合一、佛教治国与佛教政治之始。汉明帝刘庄于是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白马寺”，让二僧安居，此为中国建佛寺之始。

汉代大鸿胪卿属三公九卿大臣之一，在后汉时期其下拥有 55 名官员。“大鸿胪”这种机构负责照顾、管理外国商队，以及接待外国元首，是知鸿胪寺为古代的宾馆。大约在晋代以前，官方府署之别名皆称为「寺」。唐代舒元舆认为白马寺是官署，是依“鸿胪寺”——古代礼待外宾的场所创建的外事机构。「胪者，传也，传异方之宾礼仪与其言语也。」

### ○佛寺等同官府

所以，初期佛寺的建筑方式一定与中土的官署、宫殿、道观、祠庙建筑相同。也显示佛寺的地位等同官署，开始了“汉传佛教”「政教依存」的特色。后来由朝廷批准兴建的摩尼教礼拜寺、回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景寺与十字寺等，「寺」已广泛地作为宗教传道场所的名称。

《僧史略》中曰：「东汉初沙门，隶鸿胪寺。西晋无闻。至后魏初立监福曹，统摄僧伍，寻更为昭玄寺，后复改崇玄曹。齐梁之世，立同文寺，使主僧务。至唐初，僧尼皆隶司宾，则天朝改隶祠部。玄宗开元十四年分僧道、僧尼割署鸿胪寺，使“祠部”检校之，道士女冠隶之宗正寺。宪宗元和二年，初立左右卫功德使，僧道全隶之，所度僧尼由祠部给牒。宋朝一代准之。」可知鸿胪寺后来成为官方统辖天下僧尼的机构。

那么“寺”可以确定是等同官府的，建寺或赐予寺名还是帝王的权利。明代初定制，各州府衙与佛寺的型制完全相同，只是府衙内不种树木，而「城市型」的佛寺，中庭则种植松柏，树碑碣经幢，正殿用琉璃瓦，庭园花竹交映，加上钟声梵呗，让气氛不同于官署。

又，政府机构名称为“院”者，如翰林院、监察院，也作为佛寺的称呼。唐朝曾因玄奘大师取经回国，特别设立“翻经院”于寺中，所以“院”也是佛寺泛称之一。唐代亦另立“祠部”这种官方单位，于天宝六年（西元 747 年）后，并且发给僧尼“戒牒”以证明其出家身分。不像现在可以自由剃度，甚至有人假冒出家人。

### ○其它的道场称谓

另有“道场”梵语“菩提曼荼罗”（Bodhimandala）为佛成道之处，及晋译《华严经》卷一曰：「一时佛在摩竭陀国“寂灭道场”始成正觉。」即指中印度摩竭陀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之“金刚座”。

《西域记》：「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证圣道所，亦曰“道场”。」后亦称供养佛之处为“道场”。《注维摩经》卷四曰：「肇曰，闲宴修道之处，谓之道场也。」隋炀帝时，以“道场”为寺院之名，《佛祖统记》卷三十九曰：「隋大业九年（西元 613 年），诏改天下寺曰“道场”。」

佛教寺院深受中土建筑影响，也与“道观”没有差别。但从“寺”、“院”、“殿”、“庵”、“兰若”（Aranya，阿兰若之略称，远离、空寂处）、“精舍”、“竹苑”等名称，可用以区分与道教的“庙”、“观”、“堂”、“宫”之不同。不过，也有少数的佛教寺院被称为“庙”或“宫”，如布达拉宫、雍和宫、外八庙等，对“藏传佛教”的寺庙，一般则称“喇嘛庙”。我人皆知「天下名山僧居多」，注重山林修行的佛寺，改在城市兴建时，难免也讲究环境的布署，以营造脱俗的气氛，这是佛寺的特色。

汉传佛寺的命名有多种：如仿天竺「佛说法处」，称灵鹫、祇垣、孤园等；取「献寺者姓」，胡公寺、萧寺、贾和寺、谢寺、裴寺、刘腾寺等；取自「地名」者，彭城、邳城、北仓、虎丘、北邙、檀溪、合水、牛头山；取自「风物」者，竹林、林泉、涌泉、鹅湖、竹涧、云栖、云顶、云居、幽岩、石羊、峰顶等；企盼「治国灵佑」者，安国、报国、国祥、慈恩、永福、福宁、同泰、瑶光、安宁、宁夷、甘露、灵曜、应瑞、龙兴、定寇、宣武、兴皇、国恩、崇乐、延祚等；取「经法义理」者，法华、华严、尊胜、净名、净众、十住、文殊、观音、罗汉、般若、莲华、法性、福田等。

古代的帝王都希望佛寺里能够早晚为其诵经，才能庇佑王权永祚，让皇帝万岁万万岁，所以帝王也乐意出资兴建佛寺。虽然今日有些佛寺也仍取名为「护国」禅寺，也是意味着继续要拥护国家，但是现在建寺只能自行劝募，国家不会出钱了，时代已经大大的不同了。

#### ○借用“大雄”作为殿名

西元前六世纪初期的印度地区，据说有十六个国家：摩揭陀国(Magadha)、迦尸(Kasi)、拘萨罗(Kosala)、跋耆(Vriji)、鸯伽(Anga)、末罗(Malla)、阿盘提(Avanti)、跋差(Vatsa)、犍陀罗(Gandhara)、苏罗萨(Surasena)、支提(Cedi)、居楼(居留Kuru)、般闍罗(Pancala)、阿湿波(Ashvaka)、婆蹉(Matsya)、剑汧沙(Kamboja)等国家。

《出家品》记载佛向摩揭陀国的频毗沙罗王说：「国王啊！就在喜马拉雅山山麓，有个乡村部族繁荣富强，属乔萨罗国（拘萨罗之Kapilavastu，迦毗罗婆苏都），部族名为『太阳』，我出身的家族名释迦。」法身佛陀被称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显然没错。日本学者考据，佛陀并不是天竺太子，而是当时天竺十六大国之一的其中一个诸侯部落的王子，佛陀的家族居住聚落，范围半径不到五百公尺，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国家。

经典记载释迦族被琉璃王灭族时，全族才只有五百或八百多人，部落附近人口才只有二、三万人，好像现在的一个小小乡镇而已。乞士修行的原始佛陀，并不需要皇宫般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在“大乘佛教”发展以后才美化的。如今中国佛教对于供奉有释迦牟尼佛，不管是单尊或与他佛合供的大殿，都称为“大雄宝殿”。

如果考据确定，在东周定王八年（西元前 599 年，岁次壬戌），则与佛陀同时期，同属“刹帝利”族的印度“耆那教”（Jainism）创始者“大雄”教主（Mahavira）诞生，

年四十三岁时成为“耆那”（意为“胜利者”、“完成修行者”），于西元前 527 年入灭，寿七十二（另一说生于西元前 549 年）。基本上与佛教都是“无神论”的教派，与佛陀同时期发扬的“耆那教”，仍传递不断至今。

“耆那教”天衣派（Digambara）教徒行断发露体，故其偶像除了裸身，男性生殖器明显露出外，其他与一般佛像完全相同，恐怕被到天竺取经的法师误认佛也称为「大雄」。而佛教发展过程中，为了比同或更神圣于其他的宗教，也选用别的教常用用语来赞颂教主的美称。

佛陀虽不同意“耆那教”的教义，但对其某些戒律修持教法很接近佛教，也曾彼此参考，因此佛陀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耆那教”。“耆那教”是重视苦行、主张素食及珍惜草木的派别，中国佛学家吕澄先生也曾说提婆达多可能受到“耆那教”的影响，坚持作为苦行沙门之“提婆达多派”的「别立五法」行为与其非常相近。

但是，佛陀并不同意提婆达多所主张的要求，提婆达多认为沙门应该：露天住宿、衣着简陋、挨户乞食、不接受供养精舍的物品、不食肉。佛陀则认为提婆达多所提的要求与证道涅槃无关，衣食住行应从各地习惯，不必强加限制，尤其对老弱者要放宽。

从早期并没有，后来才增加出现于《法华经》中的〈提婆达多品〉以及《大方等无想经》中，特别突显提婆达多的地位及价值，极有可能那时的佛教才开始启用「大雄」之称号。也或许是首见于《法华经》涌出品曰：「善哉！善哉！大雄世尊！」同授记品曰：「大雄猛世尊，诸释之法王！」所以，后来中土佛殿才有“大雄宝殿”之称。就像布打（Buddha，佛），在印度只是对证悟者的一种尊称，“大雄”一辞也是通称，并不是佛教的专用名称。

## ○本书对佛教传布的分类

本书将早先在天竺、中亚、西域等地区弘传的佛教部分，属于“梵语体系”的归类称为「西域佛教」。

东传到汉地以及再传到今之越南（Vietnam）、韩国（Korea）、日本（Japan）、南诏（阿咤力教）、台湾等地区以后的佛教，属于“汉语体系”的归为「汉传佛教」，或称为「北传佛教」。

传到西藏（Tibet）、蒙古（Mongolia）、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尼泊尔（Nepal）、不丹（Bhutan）、锡金（Sikkim）、拉达克（Ladakh，查漠·喀什米尔地区）等地区属藏传密宗佛教的，属于“藏语体系”（藏、满、蒙文字系统）的归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Lamaism）。

南传至今之锡兰（Sri Lanka）、缅甸（Myanmar）、寮国（Laos）、泰国（Thailand）、柬埔寨（Cambodia）、越南（Vietnam）、南诏、新加坡（Singapore）、马来西亚（Malaysia



)、苏门答腊 (Sumatra) 与爪哇 (Java, 均属印尼 Indonesia)、菲律宾 (Philippine) 等地区的佛教, 属于“巴利语体系”的归为「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

其中南诏 (云南) 与越南, 地处佛教北传和南传的衔接处, 则依目前较熟知之情形暂各归类入第三章「汉传佛教」。

笔者是归纳手边的现有资讯, 来编写本书。所以不敢说能够面面俱到, 但写本书的目的, 为的是对佛法流传二千五百多年所产生的建寺文化, 提出来探讨, 但采点到为止, 毕竟佛寺建筑只是个硬体而已。希望读者看完本书, 仍能够将平时「追寻心外」情怀, 晓得转回「内视自心」的修持, 才是笔者真正的目的。

### ○佛法先是间接由西域传来

由于汉译《大藏经》(Tripitaka, Buddhist scriptures) 大都搜集录自西元二世纪陆续来华的中亚僧侣的译品, 通常是经过梵语佛典所译成西域的语言, 如古代以睹货罗 (吐火罗, Tokhara)、粟特 (Sai-Sughd, 希腊史料称为 Sogdiana)、龟兹、于阗文字遗留下来的经文残片。而来自西域的高僧常不懂汉文, 笔受者又不很明白教义, 如此翻译过程, 难免有误。

甚至如鸠摩罗什翻译《百论》时, 自己认为不合适就不译出。因为僧肇在其《百论》序中提到:「论凡二十品, 品名有五百, 后十品其人以为无益此土, 故阙而不传。」可见鸠摩罗什在翻译佛典过程中, 便自行取舍, 对原典进行增删, 或者修改。又如昙无讫是根据胡本翻译出《大般涅槃经》, 该经之前五分是东方道人智猛从天竺带至高昌的胡本, 六品之后是胡道人从敦煌带去姑臧给昙无讫的。昙无讫从两种胡本, 而不是完整的梵本, 编译出《大般涅槃经》。

因此, 早在隋代即有彦琮和唐代之玄奘一样感到困惑, 对前人之旧译, 仅是西域方言之译作, 并非直译自梵文, 唯恐其中有误, 加以当时译师均以“口度”, 每口传一句, 必经再三审意, 又经“笔人参制, 则余辞必混”, 而决定钻研梵语。后来玄奘便直译了《金刚经》, 可是人们却对念诵二百余年, 已经习惯了的鸠摩罗什意译作品, 口味比较合适, 所以鸠译《金刚经》流传最广, 反而不注重玄奘的译品。

彦琮提出“翻译八备”认为: 一·诚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将践胜场、先牢戒足。三·文铨三藏、义贯五乘。四·傍涉文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沉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銜。七·要识梵语、不坠彼学。八·传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才开始对佛经之翻译有了严格的要求。因此, 可知《大藏经》直到隋唐时代, 才直接有中国人或印度人翻译的经典而大成的。

从玄奘大师以后, 中国佛典的翻译就属于「新译年代」的产品。但是玄奘大师还是对印度佛经进行了修改, 他在重翻陈那所著的《观所缘论》时, 为了宏扬师祖护法大师的思

想，干脆对原文作了大修改，同时也把论名改成《观所缘缘论》。而且揉和了世亲的《成唯识论三十颂》，以及另外九家的思想，编撰成了《成唯识论》一书。

因此，目前所流传的各种汉译《大藏经》，可以说是各时代文化的集成。特别要「称赞」的是编辑、创作佛经的人士，拥有极大的吸纳能力，把当时、当地的文明消化成僧众的教科书，存写为《大藏经》，让后世的人们分享。

例如有关佛陀的本生故事，不知是引至印度原始的「童话故事」，或是被“印度教”所引用，两教至今保存有许多类似的神话。因此，今天我们不难从各教的“后造经”中，去了解各该时期文化融合的情形。诸如两妇争子，所罗门王判决将婴儿给不愿切分婴体的妇人的故事，都被改编成中国某朝某个青天大官的故事，还常被借用为佛教的仁王故事。

### ○希腊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大家公认“汉传佛教”最初是通过印度西北部，曾受古代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Gandhara，前阿富汗白沙瓦Peshawar附近，现在巴基斯坦Pakistan境内，及阿富汗斯坦的罽宾Kubhana、Kubha、Kalpa、今之喀布尔Kabul，及今印度之迦湿弥罗、喀什米尔Kashmir一带）等地传入西域，约于西元前一世纪时，再从西域传到中土附近的龟兹（Kucha，丘兹、屈支，即今库车，其闽南话发音均相同）、于阗（Khotan）等地。

犍陀罗人将古代希腊、罗马、波斯艺术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结合相融，创造出中亚文明史上甚有特色的「犍陀罗艺术」并传及于龟兹、于阗等地区。这些弘传佛法的译师来自安息国的冠以“安”姓，天竺的冠“竺”姓，月氏（月支，月亮的支护者）的冠“支”姓，龟兹的冠“帛”姓，康居国的冠“康”姓，很容易知道他们是何方来的人士。

### ○结集佛教法的必要

因为佛陀常以俗语（Prakrit，巴克利语）说法，以便使一般大众均能了解佛意。佛涅槃（nirvana）后，时日久远，世间变化多端，后来僧团口授的古摩揭陀国巴利语经文，难免应各当时的背景、需求而添加了或被另创了。如佛涅槃多年后，阿难尊者听到一沙弥背诵法句偈：「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简直是错误百出，阿难尊者好意纠正他应诵为：「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反被讥笑，最后感叹：「然众生垢重，难以诲语，久留无利，可速灭度。」而取涅槃。

传说佛涅槃后大约一百年的时候，由于意见分歧，僧团内部出现第一次公开的大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个部派，而佛法也做了第二次的结集，可见结集的内容一定与某一方的言论有所差异。

所以，可以明白《大藏经》好比旧瓶装了无数次的新酒，虽然有些老味道，但喝起来却是不同的口感，因为我们目前接受的佛法已经被复杂化，甚至含纳了许多「外道」法门。

○前冠有「如是我闻」的经典，并非全都是释迦佛当时所说。

有记载说佛灭后不久，曾是豪富深知人情世故的富楼那尊者由远地返，知大迦叶尊者（Mahakasyapa）与阿难尊者（Ananda）等五百僧众结集（samgiti，编纂）了佛法，大迦叶希望他加以认同，但「说法第一」、「雄辩第一」的富楼那尊者不予同意，即说：「你们结集的固然很好，但我还是相信我亲自从佛所听说的法。（希望自己按照从佛陀处所听闻的那样，修行佛陀的教说。）」

很显然僧团内部对教义与戒律上，已有不同的主张。某些受到正统教团压迫的支派，于是大量诵出（等于是新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经典。后来，特别是经过「各诵所闻、互质谬误、更新记忆、集成公认」，或者为了僧团存活的必要，千百年来，各地的僧团难免为了某些特殊的理由，而对教义与戒律作了调整。

今天，在佛教「国际化」交流以后，让我们能够了解并且比较出太多不同的佛教情事，有许多都是各地一厢情愿的主张，好比只剩下台湾地区的比丘、比丘尼在受戒时还「点戒疤」，自以为是维护正统外，全世界的出家人已经没有此种习惯。这种破坏脑部直觉区的坏处，造成从元代以后，汉僧的神通力减至最低，而形成仅能「念佛就好」的无奈。

当梁天监七年（西元 508 年），北魏宣武帝正始五年，菩提流支（Bodhirutchi，另翻菩提留支，后来翻译了十卷的《楞伽经》；不同于唐武后时来华的菩提流志。）来华不久后，即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视时，却发现了菩提达摩（Bodhidharma，以四卷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教法为主）的教法，其果断直截的禅法思想，竟然是他弘法的最大阻力。同时，自认为严守戒律的光统律师及其徒众，也看不惯达摩禅法的流行，就分别设计毒害菩提达摩，共有六次之多。

由于近代制片家不经详细考据的电影编剧，让信众误以为二祖神光。慧可真的是「断臂求法」。2001 年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中，温玉成研究员指出，慧可在达摩灭化后北上，辗转到达邙卫之地，却遭到道恒禅师的迫害，被砍去一臂。另外也有说是于北周宣政元年（西元 578 年）时，停止废佛行动，但是在之前慧可就被暗杀者（或者是北周的兵士）砍断一臂。

或许是后代的人自作聪明，改说禅法的求得是如此困难，要断臂才能得法，为的是让人更尊重，或者是教人退却，如今已不可知。但是，对于教法与教义上的争执或坚持，产生了许多不愿让信众明白的事实，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

因此，也可知有太多的律法或是其他的佛教禁忌，是后来各地僧团制定的规矩，并不是佛陀当时的说法。如大力提倡「佛教两性平权」，台湾的昭慧法师也置疑有了〈八敬法〉只是让男性比丘骄傲腐败，居然让比丘认为身分比佛法更重要，显然并非佛陀所说。

印顺导师也在距今（西元 2003 年）五十七年前说出，为了维系僧团，僧团制定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让人误以为那是佛陀的本意。导师说：「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甚至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不可教，这实在是对于佛法的歪曲！」

台湾南部佛光山宗长星云大师则指出，初建佛光山时，就是以「四众共有，僧信平等」的口号，才能让比丘、比丘尼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但是却有多位主张不必争取权利的比丘尼，则自我解围地说：「修行在个人，内心是无争的，何必管他平不平等。」真是令人难解。

### ○佛经为何须要重译？

荷兰汉学家许里和认为西元四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中国人懂得梵语的知识，对于佛教学说为中国僧人所能接受的，间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仅仅是：一方面通过随意的、脱漏的和经常是几乎无法理解的译文这种改变了原样的中介；一方面是通过因使用中国术语而增加误导，而这些术语已经有了确定的哲学涵义并因而拥有了广泛的非佛教意蕴。因此，有学者把在鸠摩罗什来华以前所翻译的佛经，都归为「古译年代」的经典。

所以，早期中国佛教汉化（sinicization）的进展并不那么顺利，后来才有多次重译佛经的需要。而且西域当时各教都用同一或类似语言，称其教主为佛（Buddha）、薄伽梵（Bhagavan，有福德者），也有梵天和梵行等等相同的语辞，尽管有人将“梵”解释为清静的意思，可是却很难分辨其经典分属何教，其教义是否合乎佛陀的教诲。

因此，我们可知为了维护佛法及僧团组织的生存延续，“佛法第一次结集”后，尚未完备，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并未得到当时全体佛弟子的认同，即自后来三次的结集，是否仍能完全保持佛陀说法时的原貌，而在后代没有添加或更改，更值得深思、值得怀疑。

### ○后造经是「加上说」

从历代对「伪经」（apocryphal scriptures，或许称为“后造经”，才不会磨杀造经者的用意。）的众多研究文献看出，古人虽然很努力提出建议，如唐道宣《占察经》一度将列入疑伪经录中，到了大周时，就正式列入《大乘单译经目》中。可见汉译《大藏经》（Tripitaka）一直很努力将各种经论收编进去，却让后世的信徒读得很辛苦。可是我们应该深思为何编者要如此？不知道谁能给我们答案。

以中国佛教徒常诵念的中文《金刚经》（Diamond Sutra）来说，它是一部没有佛陀肢体「放光作怪」的智慧经典，现存版本就有八种，而《心经》也有十一种中文版本。以中文《金刚经》为专题研究的法国 University of Providence Aix-Marseille I 青年博士孟承书先生（Dr. Montoneri Bernard）就发现《金刚经》各版本中，计有一百多处值得争议的地方，已于西元 1999 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公开之。

如被归为「旧译年代」时期，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金刚经》其中四句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后来，元魏时菩提流支所翻的，接着增加了：「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代时真谛所翻接增的是：「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就是最好的明证。不过，经典的增删以后，如果没有偏离主题，并不损正法的弘扬，不会产生反效果或误解，应纯属翻译上的考量，就不必计较。

《金刚经》有多处「如来说…，即是非…，是名…」的句子，但是不能随便套用，若如台湾南部某大师，在纪念馆奠基时所说：「我说该非佛像，看久了就是佛像。」若一般信徒误会了是套用该句法，就离错经意，误解了《金刚经》的说法。否则说：「我说非佛法，听久了就是佛法。」这样会通吗？应该是：「我说这尊抽象的佛像，即是非佛像，看久了是名为佛像。」

### ○帝王干预宗教，古今皆然

自古不分中外的执政者唯一能见到的是利益，想到的都是皇祚政权的持续，于是朝廷的推崇与利用宗教是必然的现象。来个脑力激荡一下，清乾隆皇帝于《喇嘛说》一文曾说：「我满洲以骑射、“国语”为根本，苟必欲如汉人之文义，蒙古之经典，则非弹十余载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骑射武备乎？」所以他让汉人、蒙人去读一两遍他刊印的《乾隆大藏经》，有识之士都会消耗个十来年或半生，则天下太平矣。那么，各当时对帝赐《大藏经》中经文的真伪，是不敢怀疑，也不必太计较的，因为有如是缘故的。

还有从大多数印度及西域人倾向于自我泯灭和无视个体的趋势来看，所有“大乘”经典都不适当地托是阿难听闻佛陀之说，以「如是我闻」或「闻如是」来标榜。他们认为凡是妥善的回答，都是世尊或尊者和正等觉者的话语。印度（或罽宾？）人并不关心作者是谁，也不理会和旧说是否矛盾，这正是印度文化的特性。

另外，西域诸国帝王下令编造佛经，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转轮圣王”或菩萨转世，托说佛陀当时即曾预言，然后往各国输出。而且汉译《大藏经》都曾经过帝王干预，为顺应国情或教化顺民，都有意作了增删，许多经文就有梁武帝、武则天等等帝王插手的痕迹，至今犹在。

这种例子在其他宗教也曾发生，公元 325 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一次基督教宗教会议上，为了让子民积极信仰《尼西亚信经》，君士坦丁和他母亲海伦娜下令删除新约所有提及的轮回观念。同时基督教《新约全书》福音书的选用情形相同，就是那次会议时，由 318 位与会的主教从最初三个世纪一大堆矛盾和伪造的手稿中，先挑出 40 本福音书放在祭坛下，最后再由“桌动”或“书跳”的方式决定成目前印刷为圣经的福音书四篇，完全是人为的干预。（见德国恩斯特·海克尔着《宇宙之谜》教皇神圣论等文）

## ○谁意识到真理，谁就是佛

印度人他们并不重视历史的真相，对于一部著作或一部经典唯一关心的是是否阐述了当时所要的真理，而且印度人视「觉者」为佛（Buddha），无论谁意识到真理谁就是“佛”。于是“大乘佛教”就像旧瓶加装了新酒，才敢把当时、当地的有利于「教化」众生的各式各样文化编进，都归之为“佛”（觉悟者）曾说过，才有如今无比庞大的《大藏经》。

也由于后世佛法系统诸师的「谦虚」，好比历史悠久又有名的大学，经过年轻教授们一再提出新的观点，但因感恩而且不敢居功，一切都推尊给创系的老师（创教的释迦佛）。如此近三千年，大师们若有创说，当然都会托为佛说，在经文前均冠以「如是我闻」（This is so I heard）或「闻如是」。早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大阪商人富永仲基（西元1715-1746年）就提出那是“加上说”，是后人把新思想在前代的思想上加上去，才有如此庞大又相互矛盾的经藏。

民国初期，唯太虚大师之著作，就敢直接冠以「如是我闻」托如佛说。也可知道自古以来僧众们早已发现这种事实。如以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时的演说词为例，不到五十年间，国内就设有了〈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各种机构，并且有了庞大的各种著作问世，“加上”来演绎孙先生的思想（幸好台湾教育部早已决定取消高中〈三民主义〉的课程）。同理以佛陀的根本教法，后来为何会发展成庞大的经、律、论藏，就不值得稀奇。

## ○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因为佛教并不认同「神圣天启」的经典，不认同在人与人之外、之上有「神圣人格」的存在。有人认为佛教不是「天启」的宗教，佛教是「人本」的宗教，它是人类累积的共同智慧，是保存许多世纪来持续不断的哲学思维的成果。但若以佛、菩萨从天上界来地球投胎做人，把大宇宙的真理告诉我们，那么佛教也应该是「天启」的宗教。因此，只要是讲宇宙的真理，是智者的思想，都可以“如是我闻”地被记载下来。

古代天竺地区缺乏文字记载，经文都是僧侣以强记背诵方式传下来的。因此，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可以把经典自由的添加，大师们甚至自创或是集体创作教义（尤其是“大乘佛教”教义），也不必畏惧被指为异端邪说，是十分有别于其他的宗教——神说的启示。因而，我们知道佛教是靠个人努力追求和谐、喜乐内证的宗教，是宽容的、包容的、理性的、认识的宗教。

## ○大乘佛教的吹嘘

可是，碰到外道(外教)在吹嘘的时候，“大乘佛教”的法师也不干示弱，也会把佛陀的一切生平作过份的宣扬。于是创造了许多神话，发现对属于低文化层次的群众，无法以教义引导时，那么便采取神话和灵异事迹来建立信仰。常见有人不察，著书说佛陀就是古代「印度国」的皇太子，此乃过分推崇的心态。如说悉达多太子上学时，有一万儿童、十

万少女伴送，简直是不可思议。

当时天竺有十六个城市大国，共约数百个王侯割据着整个古印度，其中靠近尼泊尔的释迦族人是总计不到千人（经典或说是五百人，或说是八百人），净饭王（Suddhodana）所治理的「部落国家」，只是一个山区的小小部落，那来一万儿童、十万少女？何况哪有那种学校可以容纳？光是上厕所就有问题，还谈得上能听老师的课吗？而且若直说佛陀是部落酋长的儿子，也不损佛陀证悟般若的事实。

又有佛教神话说悉达多太子能够一箭射穿五十里远处悬置的铜鼓，好像是有现代短程袖珍飞弹装备的功能。佛陀灭度的时间越久，法师们为了教化民众，便照“婆罗门教”的轮回思想充分「神格化」了佛陀。所以，佛经有些夸大其辞的故事就不必当真。其实，现在聪明的法师就不会说这种连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故事。可惜如今仍有不少在台面上讲经的法师认为反对这些神话的人就是“波旬”（papima，恶者、魔），或加以威胁诅咒的口吻说那种人就是谤佛、谤法，要反对的人下“无间地狱”，这才是最恶毒的笑话。

譬如，中国道教徒说武丁二十四年（西元前 1301年，岁次庚辰）的二月十五日，老子李无果生于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涡水之阴。说其母玄妙玉女怀胎八十一年，后于李树下破腋而生出老子，因生在李树下，故以「李」为姓。佛教徒一看就会笑说这个是神话，甚至指出那有可能人会从腋下生出？通常听他教的神话，人们都会很理智地，而且能很快分辨出真伪来。

可是，听教内大师们的吹嘘时，如佛陀初生即有「右腋出生」（根据天竺神话，刹帝利种姓应该是由梵天胸部出生的身分所编出来的神话。）、「不扶而立」、「行走七步」、「指天指地」的神话，却宁可信以为有、信以为真。但是云门祖师就讲说：「如果当时我在场，我就一棒把他打杀喂给狗吃！」可是要知道，能这样才正是突显“般若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能够报答佛（觉悟）之恩惠。

还有，许多流传在西域的神话故事，如有因为老鼠帮助打败敌军的故事，本来就是希腊的童话；劈分小儿的处分是所罗门王处理争执的急智，但改成为西域的宗教神话后，有些佛教徒就会肯定那是千真万确的事。

## ○佛教的演变

初期“小乘佛教”（Hinayana、Less path or Less vehicle, Sthaviravada, 今称“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主张无常（impermanence）、苦、无我（anatmya）、空，每个人都想达到同佛一样的境界；“大乘佛教”（Mahayana, Great path or Great vehicle）却转变为常、乐、我、净的追求，更由一佛衍生为多佛，由阿罗汉（Arhat, Luohan in Chinese）进而为菩萨（Bodhisattva），也将释迦佛的种种性格、精神实体化、神圣化，进而产生（或发现）了大日如来（Vairocana, 毗卢遮那）、药师如来（Bhaishajyaguru, Yakushi in Japan）、阿弥陀如来（Amitabhah, Amida in Japan）、阿门佛（Akshobya

）、宝生佛（Ratnasambhva）等无数佛；僧尼也由乞食的“托钵生活”而渐渐改为“丛林生活”了。

虽然，从历史伦理人格的释迦牟尼升华为宗教化超历史、超人格的“大乘佛教”之“如来”（tathagata），但是“大乘佛教”主要的基本教义如三法印、四圣谛（Catursatya）、五戒、（Pancaskandha）八正道（eight aksana）、十善、十二因缘（Dvadasanga-Pratityasamutpada）、三十七道品等等教规戒条是相同的。而西元八世纪开始，“大乘佛教”又被以「颂咒、打手印和观想」为主要修行方式的“密教”（Guhya）所取代，经文也已从“巴利文”改用“梵文”。

约造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在当时出现的《道行般若经》（As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对俗人应该如何供养法师、七宝塔、佛像及经典的情事，特别作了很精详的规定，被当作是一部“初期大乘”（the Early Mahayana）的重要经典。魏甘露五年（西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等一行人，为访求《道行般若经》，西渡流沙到达于阗国，却在于阗找到大乘经典《放光般若经》。

当朱士行欲将《放光般若经》送回洛阳时，曾受到“小乘教”教徒强烈的反对，认为「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赉经。」并要求于阗王严禁传布《放光般若经》至汉地。所以迟至西元282年，晋武帝太康三年，才由弗如檀将抄本送至洛阳。可见当时的“小乘教”徒认为“大乘教”无异于“婆罗门教”。

研究各国的佛教建筑，必须了解当时、当地的情势，由每一个国家的治乱情形，就可以看到该国僧侣为了安抚或救渡国民，便特别强调某种宗派法门。因此，从寺院建筑及佛像主尊的不同，也让我们了解时代性的世俗民心，更反应出佛法的适应性和强韧性。更可从布达拉宫的雄伟意象，见到西藏僧团以「教政合一」的方式统治着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建筑，是不足以反映宗教政权的至高无上，如此也才能让人民信从，成为「佛化」的国度。

## ○西域中亚地区大乘佛教兴起的源头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西域中亚地区，是东西文明的熔炉，“汉传佛教”是以“印度佛教”为父、“丝路佛教”为母而诞生的，虽说「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但是并非直接得至原本的印度佛教，而是在西域中亚地区经过「综合」后的文化。何况印度次大陆本来就是多种异质（族）文化集大成的地区，中亚和西亚各国、南北民族，东西文化、宗教、信仰冲突皆交融于此，这里也是“大乘佛教”兴起的源头。

有些学者就主张，比起小乘经典，像《华严经》、《般若经》、《解深密经》等等大乘经典的系统严密、思想精深，呈现的是经过统一制作，内容结构也比原始经典庞大，其语法也大异于前，很容易明白这是后来结集时定稿的作品。



“大乘佛教”的特色只要是能维持基本教义的原则，凡初心或已成就者，具有各种教学的智慧与能力，便能破除一切障碍，掌握各种情况，尽量采取「善权方便」(Skilful means)、「顺权方便」的手段，随心所欲来干预和参与社会的世俗生活，认为能深入民众，才能救度众生、利益众生。

如《维摩诘经》(Vimalakirtinirdesa)说：「是时维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曰维摩诘。在先佛已造行修善，本得法忍，已得辩才，神通游戏，得无所畏，降魔劳怨，深入微妙，出于智慧无极。善权方便博入诸道，令得所愿。」《顺权方便经》说：「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已逮总持，辩才无碍，获无所畏，得不起忍。奉无数佛，殖众德本，皆志大乘至不退转，弘无尽哀，救济十方。」

所以，“大乘佛教”变成适应性比“小乘佛教”甚至所谓外道强了许多，其包容范围更广，吸纳能力也极强，凡所及地区，无不带有各民族的特点，并产生相应的教法。可是，各民族、各国度的法门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往往就产生相互矛盾，甚至变得偏狭的情形。从“汉传佛教”二千多年来的传播，可以看出在中、日、韩、台等国的佛教宗派，已经变得各有特色，在「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中，各地大师们弘传的法门便有所选择、有所发挥了。

日本佛教的“法相宗”以《唯识三十颂》为信众的圣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日本士兵都随身携带《唯识三十颂》，有位死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身上，就发现一本日文译本。日本的“日莲宗”则坚定认为诵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中文经名的唱题修行法，会胜过其他宗派。由于有太多的佛经，太繁杂的教义，中国和西藏的大师们也曾有强调信徒要遵行「一师一法一本尊」的修持方式，这或许也是一种对经典太繁琐的反制行为。

出土才四十余年的《房山石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大藏经》，雕刻着《契丹大藏经》的万余块石板经书，被保存在北京房山区的云居寺(Yun Ju Temple)，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据说有唐玄宗的八妹奏请钦定新译的《开元大藏经》和后来的《契丹藏》。其中还保存着六十多种经文尚未收入木刻版的《大藏经》，都是早已散失或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希望有人能够详细的研究、比较，或许对现今的中国佛教徒有新的贡献。

○大乘佛教开始有了佛陀的偶像崇拜以后，才需要佛教建筑。

所谓「大乘」或「小乘」二词的用法，在迦腻色迦王时代就很普遍了。初期大乘僧人在自称自己为“大乘”时，在历史上便出现有「大乘非佛说」的论调，无着菩萨的弟弟世亲(天亲)菩萨在未信大乘以前就曾说「大乘非佛说」。《婆薮盘豆法师传》说：「(世亲)法师既遍通十八部义，妙解小乘执小乘，为是不信大乘，谓“摩诃衍”非佛所说。」佛灭后之第二百年中，以「由不亲闻佛说大乘故尔」，当时的大众部弟子也曾提出「大乘非佛说」的论调。

但是，后来「大众部」僧人又信受大乘「等同佛说」有三个理由：一·或由亲闻佛说大乘，故信受此经。二·能思择道理，知有此理故信受。三·由信其师，故信受师所说也。玄奘大师曾参访的胜军居士，曾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论证〈大乘经也是佛说〉，以“两俱极成非诸佛所不摄故”，只要合乎佛意，即可证明诸大经典皆是佛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驹泽大学教授松本史朗与袴谷宪昭，分别撰写《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本觉思想不是佛教》，“本寂”与“本觉”应有所分别，严厉批判具有“一元论”（基体说 dhatu vada）的汉化佛教思想是「伪佛教」，就有了「批判佛教」的运动，「大乘非佛说」思想再度被渲染开来。但国内有识之士如萧平实居士等，已为文评述此“如来藏非佛说”之论点（若无如来藏，则容易落入生灭意识心之常见。）对渠等一己之见有不同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参阅。

很多人不知道原始佛教不仅不崇拜偶像，并且反对偶像崇拜。释迦牟尼佛并未教导弟子向神灵祈祷，甚至也不向佛陀求助，原始佛教信徒都是依照佛陀的教示，自助助人解脱烦恼，不像印度教一直是祈祷的宗教。佛灭度后初期约五百年间，印度的工匠不敢奢望去表现永远灭尽（Pari-niravana）的佛陀的人间肉体像，因为永远灭尽的佛陀的「法身」（dharmadhatujakaya）形体，人与天都是看不到的，于是就有不可表现佛陀最后身的禁忌。

但是，佛弟子们有强烈的皈依需求，便把与佛有关的东西都神圣化了，终于产生了“圣物崇拜”。当时的佛传图画只好以平（伞）盖下的空座、佛足印迹、顿悟时的菩提树（Bodhi-tree）、转法轮所用的轮宝（dharma-chakra）、三宝标志（triratna）、离宫时所用的马、诞生时所用的象、经行处、涅槃后的舍利塔、弘法柱、金刚座等来暗示佛陀的曾经存在，即已满足于象征其精神的存在，主要的修持是以深入探讨佛法真理为主。

故知在早期僧团的意思里，是有严禁以人形姿态来表现佛陀身像的理念。原始口传的经典讨论的都是「三法印」、「四真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等修行的义理，还没有如何造像、建寺的规定，若有也是佛陀圆寂五百年以后才开始造作的。

## ○阿育王的企图

古天竺「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的阿育王（Asoka，又译阿恕伽或阿输迦，即无忧王，西元前 268-233 年在位，时当周赧王四十七年）早先并不是信仰佛教，曾杀诸兄长，其生性残暴，侵略诸国，以血腥的杀伐征服一直不肯低头的謁陵迦王国（Kalinga），杀人无数，使血流成河。他首创「地狱」来统治人民，但仍无法掩饰因杀伐战功随来的孤寂与懊悔。

后来，阿育王受到高僧尼瞿陀（Nigrodha）的教诲，他「发现」弘扬佛法，并塑造自己成为佛教的转轮圣王（cakravartin），认为这样可以弥补杀伐的罪孽，并可受到人民的尊重，于是转变信仰佛教，进行历史上最广大的计画，其收效也更伟大的弘法运动，成

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护法者（sacadhramathitasa），在后来则成为西域诸胡人皇帝效法的榜样。（但阿育王及丘就却后来并未善终，一饿死、一断头，可见业报因果不昧。）

阿育王统治全印度的「孔雀王朝」时期，佛教兴盛，外道无立足处，就化成了「贼住比丘」混入佛教中，部分假藉佛陀之名，而著作有利于流传与弘扬其“婆罗门教”、“耆那教”、“波斯教”、“希腊教”之原习的教义，便增加了佛经的庞杂性。可是阿育王也乐见如此，因为阿育王有句名言曰：「法之征服，为最上之征服。（The Conquest of Dharma is the best Conquest）。」

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中说，有一个传说阿育王曾派遣以释利防（Sramana）为首的大批僧人历时三年到达中国，却被秦始皇（西元前 221-208 年才正式称帝在位，而阿育王早已在西元前 233 年去世）赶走，故有学者认其为伪说，如同阿育王曾建塔在汉地洛阳山中，释慧远（本名刘萨阿）发愿觅阿育王塔，称至建业礼长干阿育王故舍利塔，又至鄮县拜阿育王塔，纯属虚构，皆不可考，却被一些「感性」的佛教徒所深信不疑。

## ○佛塔建筑的开始

周赧王五十六年（西元前 259 年），阿育王决心以一生及其全国之力，完全奉献于佛法（Dharma）的宣扬，相信佛法为开启天上之门钥，并保未来芸芸众生幸福之安稳。于是阿育王开始建立寺塔，派“布教师”远赴各地，置“大法官”（Dharma-mahamatra）监理宗教之事，俾使正法得以广弘。

并规定在国都每五年、诸侯领地每三年，开大集会，以与地方官讲习“讲习正法”之机会。并于各领地镂刻敕令，竖立石碑、石柱，以施宗教的训诫于一般民众，或亲到各圣地巡礼佛迹，立纪念碑，或时矫正僧风，翻修佛刹精舍。

阿育王宣布佛法为其国家的主要事业，王力所到之处，佛日增辉、正法常胜，其“岩石垂谕”记说：「王为正法之胜利，即最上之胜利。而王复于其领土相距六百由旬（Yojana）之临国——希腊（Yona、Yavana，耶婆那）王安提阿匿斯（Antiochos Theos，塞琉古国，今西亚、中亚一带）之所在；于其北则托勒密（Ptolmy，古埃及）、安提峨那斯（Antigonas，马奇顿国）、马加斯（Magas）及亚历山大（Alexander，今希腊西北）四王之所在；于其南，则绰那（Chola，朱拉，古代南印度小国）王国、判达维（Pandyas，潘迪亚，古代南印度小国）王国及锡兰（Seylon，泰拉巴尼 Tamraparni），皆遍被正法。即王领地所在之地，舆那人（Yonas）、堪波佳斯人（Kambojas）、内布哈喀（Nabhaka）之内布哈旁谛斯人（Nabha-pantis）、贺札斯人（Bhojas）及比丁利喀斯人（Pitinikas）、安提那斯人（Andhras）及普林达斯人（Pulindas、Paridas）之间，皆得法胜，到处皆为王令归顺正法之宣谕。虽王使未到之处，亦有归顺正法之敕教，及闻皈依之说法，先后皆当行之。」

阿育王在国势强盛时期，配合国力的扩张，以及商业经济的需要，同时派遣佛教长老

远赴各地弘法，广造佛陀舍利塔（Tathagata-devakula，“如来神庙”），并在佛教圣地及大城市矗立“弘法石柱”与“岩石垂谕”（Rock Edicts），当时也还没有佛像出现，当然也没有佛殿建筑。

另说阿育王曾下令僧团停止教义上无谓的争辩，更遣使及传教师至边境弘扬佛教。阿育王（有可能是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也派令其子玛印达（Mahinda，或摩晒陀）及其女僧伽米塔（Sangha Mitta）至锡兰（今斯里兰卡 Sri Lanka）传教。当时更有相当多希腊裔的佛教信徒（Greco-Buddhist）因此加入了佛教僧团。

后来，在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里，登基成功的帝王大都是以阿育王为榜样的君主。阿育王的一生，先是兄弟相残，继以四方征讨建立功业，最后即弘扬佛教，此事迹最令南洋国家的君王羡慕与模仿。东南亚不少君主的生平和阿育王相似，如西元前二世纪，斯里兰卡的杜塔嘎摩尼王（Dutthagamani，西元前 161-137 年在位）一统天下，扫除各小王势力，佛教才再度抬头；十一世纪的缅甸的阿奴律陀（Anawrathta）王，杀了自己的兄弟，建立「浦甘王朝」，后来转为佛教的「法王」；十五世纪泰国的提勒卡罗扎（Vilokaraja）反叛其父，后来也皈依佛教。

#### ○丘就却利用佛教施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此后，于汉明帝永平二年（西元 58 年），天竺地区的第三位“阿育王”，也就是奠定“大乘佛教”的创始者——「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西元 50-102 年）创建者丘就却（Chiu-chiu-chio，库就拉·卡都皮塞斯 Kujula Kadphises，生平西元前 5 年-西元 78 年）登位第八年，开始正式采用“佛教政治”治国，于华氏城（Pataliputra，波咤利弗特拉城）建立「阿育王僧伽蓝」（Asakarama）。

同时，由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选千僧召开“大乘经论结集大会”，结集完成（Samgiti，讨论制定经典）初期大乘经论，这是初期大乘崛起的年代。亦即传统佛教史上所称“第三次佛经结集”（the third Buddhist council），也为“贵霜王朝第一次佛经结集”（但也有学者说是阿育王赞助了第三次的佛经结集）。当时只要支持大乘信仰或佛教政治活动，都是“大乘人”，因此大乘僧团的成员即有“上座部”（the Sthaviravada）及“大众部”（the Mahasanghikas）的僧人。

「没有丘就却或贵霜，就没有大乘文化」，这是最切确的看法。贵霜诸王接受了流行于印度与中国的“王权神授”的观念，也因让“大乘佛教”成为贵霜等国的“国教”，便以大乘信仰及其实践法来治理国家，人人不可不信仰，不听佛法即威胁要被断头。《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就记有：「尔时严焱王，敕令国内一些城邑，乃至聚落主等，各将所领及家眷悉共庄严俱诣佛所。若其不往如来所者，当断其命。」

因此，才有“大乘佛教”在古印度（摩揭陀国（Magadha）、罽宾国（Kubha、Kubhna，Uddiyana 乌菴那等一带地区）、犍陀罗国或今之阿富汗（Afghanistan）北部，巴基斯坦

(Pakistan) 北部, 尼泊尔 (Nepal) 或印度北部, 随着贵霜或孔雀王朝的兴衰而消长, 也开始造成佛教政治性压迫、毁灭他教与被教压迫、毁灭的因果报应之现象与命运。也使当时的佛教信仰, 变成非单纯的宗教信仰, 而转变成为神权时代配合“政教合一”特色的「愚民政治」理念或信仰。尤其这些事实一直是佛教徒所不敢碰触的问题。

当然这都不是“大乘佛教”的本意, 只是无奈于有野心的帝王插手干预, 真正实修的僧侣是不会与那批“御用僧官”合流, 许多优秀的僧侣默默着传续着正法, 才让佛法中的一股清流绵绵不断地传至中国。

## ○帝王即佛

古印度是由奥族人、荼卢毗人及雅利安人三大先期殖民民族, 形成其思想与文化的。前两者形成印度非正统文化, 而后者后来居上, 主宰了印度之统治权, 形成主要的“吠陀文化”。印度的前三种姓, 同有入宗教生活的特权与义务。他们的一生分为四期: 「梵行期」Brahmacarya、「家住期」Garhastya、「林栖期」Vanaprasthya、「遁世期」Sannyasa。住家期仍能婚生后代, 佛陀早期也如此, 有婚生的生活。

根据经典记载, 做为靠近尼泊尔山城部落酋长儿子的悉达多, 其于王子时有耶输陀罗、乔比迦、鹿王三妃, 并生有子善星 Sunaksatra 与罗侯罗 Rahula (后皆出家)。当进入「林栖期」开始时, 全社会自动供养僧侣, 不会有所计较。

依佛光出版社的《佛教史年表》记载, 西元前二~三千年, 印度文明(历史)肇始, 约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国商代祖辛朝时期, 可能来自里海地区的波斯族旁系的雅利安人(梵音 Aryan) 入侵印度五河流域地方, 约西元前四百至一千年前后西周穆王时代, 雅利安人移居到恒河流域, 是“婆罗门教”成立期。

西元前四百至一千年前后, 印度成立四种姓制之雏形。成立“婆罗门教”的《吠陀 Veda》本集, 《梵书》文献, 初期《奥义书 Upanisads》。憍萨罗 Kosala, 摩揭陀 Magadha (中印度王国, 佛教摇篮), 阿般提 Avanti, 跋蹉 Vatsa 等四国兴起, 诸都城工商业发达。六师外道辈出, 各倡〈唯物论〉、〈快乐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想。

“婆罗门”灌输每一个时代的人要对“祭师”尊敬的意识, 进而建立他们这一阶级的尊严, 并维持其不容易取代的优越地位。只要传统宗教领袖和信仰者坚持, 虽然印度在法律上已经废除「种性差别」, 可是如今仍然无法实施。就在释迦佛时代, 就开始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争夺, 由“刹帝利”种族的武士权贵们手创的佛教, 通过教徒本身的活动, 来与“婆罗门”争夺印度的宗教领导权, 期间就达千年之久。于是尽管到了最近, 佛教一直被视为印度教的大敌之一。

而争夺的结果, 天竺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也是高于俗人, 也高于君王。胡教(佛教)僧侣来到汉地便与儒教产生“夷狄之争”, 在东晋咸康六年(西元 340 年), 朝廷里就兴

起“是否沙门应礼敬王者”之论，并无结论。

### ○汉地僧人接受官位的开始

后来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从五个方面阐述沙门所以不向王者礼敬的道理，竟能得到桓玄的确认，从此对中国佛教的礼仪确立了重大影响。可是北魏太祖时，沙门却破坏了这个戒条。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立沙门法果为“道人统”，及太宗明元帝时拓跋嗣即位，弥加崇敬，四年内前后授以“辅国”、“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

这是出家人在中土受世俗官职和封号的开始，也是让佛教“世俗化”，听命于君王恶例的开始。虽然文献上说他没有接受，但为报知遇之恩，竟然带头拜起帝王来。《魏书·释老志》记说：「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礼佛耳。」

### ○弘法天子的自许

“当今如来”之美称更对统治者的地位有所增强，从此中国的胡人帝王陶陶然，乐以扮演“如佛、即是佛”及“人王即是法王”的角色，展开以“帝王即是佛，皇权就是神权”此种等同“君权神授”之“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竟然不约而同地蔓延在有佛教信仰的国度。

中土的帝王都以“天子”自居，意图推翻前朝者也常以“替天行道”的口号来发动革命。古代的封建借口配合此种“佛教政治”的传统，后来为东方各地区的帝王所引用，首先帝王神化自己为“当今如来”或“弥勒转世”或“菩萨”或“转轮王”（cakravartin）或“法王”，正如欧洲的天主教，亚洲佛教的责任之一也是协助提供王权合法的证明，于是成为印度、中亚、西藏、中国、韩国、日本、柬埔寨、印尼、蒙古等地区的政教文化发展的特色。

而古代单纯的游牧部落人民，更容易被教化相信现世「英明」的君王就是神的降世，并且连同他的妻子也是。直到在十八世纪，民智还是封闭的年代，蒙古的“喇嘛教”徒还认为世界上的可汗仅仅只有四个，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松赞干布汗是“喇嘛教”的保护人，蒙古人渴望能再转世的成吉思汗，博格多汗是中国皇帝和智慧之神文殊师利（嘉姆央）的化身，察干汗被视为俄国的统治者与救度佛母的化身。后来有任何一位被尊崇的高僧去世，信徒都宁愿相信他是（was）菩萨的化身，而不说是“宛如”（as）某某的化身。

南朝时期（420-479），刘宋武帝刘裕与僧人慧义编造神话故事，利用佛教祥瑞的情事，造成篡位成功的神化、正当化；最可笑的是韩国新罗王朝第五十二孝恭王（西元897-911年在位，时当唐末昭宗、哀宗时代）十五年时，有一曾出家为僧的新罗王系人（自称新罗王子）弓裔变乱坐大，改国号为“后高丽”（或泰封），因其得胜甚易，日渐骄狂自大，弓裔便自以为是弥勒佛的化身，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

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由于傲慢无人，部下动则得咎，日失人心，导致在新罗景明王二年政变，部将拥王建为王，弓裔逃至平壤被杀，结束此一闹剧。

明武宗朱厚照勤学藏语，颂经习法，穿戴僧服，自封「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大自在佛」，铸成金印，用之诏书，俨然佛教的「法皇」。清朝时还有多事的御用文人编造五百罗汉的传说，将俗人像的康熙帝充为“暗夜多罗汉”、乾隆帝为“直福德罗汉”。

而「贵霜王朝」或「孔雀王朝」的“佛教政治”是佛教转轮王的“大王政治”，“大王”（也是“法王”）就是佛教的“护法者”（sacadhramathitasa），其施行总部与造经、造像中心，即为「阿育王僧伽蓝」，并在各地设立「如来神庙」（cakri sangharama），做为其地方教化人民的中心，其建筑结构，都采一佛塔或一葬塔、一寺与一佛、一转轮王造像或石窟，以表示法施与色施的护法信仰建筑法，根据当时佛经中的说法，全国共立八万四千塔寺，作为全国及地方实际策划及传布大乘佛法之中心。

### ○中土佛教政治的滥觞

此「如来神庙」的制度，后来被焉耆、龟兹、于阗的国王所学习；并以中国南北朝各帝王采用最繁、最长，先由北凉（西元 397-439 年）的匈奴族系沮渠蒙逊，从龟兹学得如何推行“佛教政治”作佛教的转轮圣王，之后北朝北魏（西元 386-534 年）鲜卑族的拓跋氏帝王也效尤有方，并在云岗造石窟，大量雕塑佛像及轮王像，以推行“佛教政治”教化国人。

因为佛教的政治施行方法及其发展状况，都被记录在大乘佛经及文献中。从经典中可以看到统一造经及译经的活动，建塔及造寺的活动，甚至开凿石窟及造像活动。从最有名的月氏王，更是阿闍世王被影射为他，也就是「贵霜王朝」（The Kushans，西元 50-244 年）的丘就却（有月光菩萨、香山王、犍陀罗王之称）开（创）始施行「政教合一」制度，有了佛教政治发展的特色，都是用“大乘佛教”信仰作为教化人民的方法。而可能源自埃及，寄望未来、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Western Paradise）的「净土思想」便在此后之印度的西北区流行过。

但约经五十年左右后，「贵霜王朝」之继承人阎膏珍（威玛·卡都皮塞斯 Wima Kadphises）到胡为色迦（Huviska）当政时期，贵霜的这四代帝王，却不是沿用“印度教”的转轮圣王政治传统治国，就是用伊朗的宗教政治观治国，所以“佛教政治”不仅不能发展，“大乘佛教”也没有一点进展。因为「贵霜王朝」与「孔雀王朝」前后年代差别约三百年，丘就却虽亦称为阿育王，并不是阿输迦（无忧王），可是经考证丘就却对“大乘佛教”后来能够推广之贡献，大于阿输迦。

### ○后贵霜王朝也采用佛教治国

「后贵霜王朝」(The Latter Kushans, 西元 187-244 年, 时当东汉灵帝、献帝在位时期)的迦腻色迦王(Kaniska III, 也称罽膩伽、迦尼迦、迦尼色迦、金毗罗、恶生王或素毗罗王)战胜帕提雅, 扩大了在北印度的统治权, 他的版图包括恒河和印度河流域, 西起咸海, 东至葱岭, 形成了庞大的帝国, 国都在富楼沙(Purushapura, 今之白沙瓦, 意为“丈夫城”)。在采用佛教治国之时, 不但步丘就却的后尘, 在罽宾(迦斯弥罗, 喀什米尔及今之卡布尔 Kabul)也召开“大乘经论结集大会”, 结集了许多“大乘涅槃系”的经典, 而且也建造了许多塔庙及造像。

西北印度因地理环境的影响, 自古以来必较保守, 而东印度则率先以革新的精神, 敢将佛典颠倒错置, 并肆意篡改佛经的文句。古西藏学者达拉那达在他所写的《佛教史》中提到, 当时有胁尊者从东印度来到罽宾, 带来了与善知识有关的稀有经典。迦腻色迦王听到后, 便召集五百圣贤比丘于罽宾, 成就了佛经第四次结集的大业, 这就是“大乘佛教”成熟的先声。

此大业于《大唐西域记》卷三《迦斯弥罗结集》中条载:「是五百圣贤, 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钵论〉, 释〈素咀纛藏〉; 次造十万颂〈毗奈耶婆沙论〉, 释〈毗奈耶藏〉; 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 释〈阿毗达磨藏〉。凡三十万颂, 九百六十万言, 备释三藏, 悬诸千古, 莫不穷其枝叶, 究其浅深, 大义重明, 微言再显, 广为流布, 后进赖焉。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鏤, 镂写论文, 石函封之, 建窣堵波, 藏于其中。」

这个时期开始, “大乘涅槃系”(the Nirvanavada of the Mahayana)的僧人为了统一造像的方法, 甚至造有造像经典如《悲华经》及《佛说弥勒下生经》等, 作为此时代造转轮圣王及弥勒佛(梵文 Maitreya、巴利文 Metteyya, 藏音迈达里)身像的造像手册。(以上有关采用“佛教治国”的详细研究, 请参考古正美博士所著《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一书, 述之甚详。)

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在《弥勒净土论》中提到:「佛教对于“未来佛”的信仰, 不仅在佛陀时代, 而且至少在佛陀灭后的约三百年间也还没有产生。」弥勒信仰乃是大乘佛教徒创说出来的。但是自从「后贵霜王朝」强调弥勒佛下生信仰以后, 可由各地区或民族信仰弥勒佛下生的发展情形, 来判断那一个民族或地区曾有「佛教政治」的发展, 这是当时大乘佛教法师们料想不到的事。

可是弥勒信仰却一直被民间利用为革命的思想工具, 历代宣称“弥勒再世”者, 都有改朝换代的叛国企图, 弘扬「弥勒净土」说法, 反而很容易被朝廷定为“邪教”而遭忌, 这也是后来让阿弥陀「净土思想」独盛的原因。

### ○喇嘛教在蒙古传播的因由

元、明两代的蒙古贵族, 深知“喇嘛教”(喇嘛即上人、师长之意)宣说源自“婆罗门教”的“因果轮回”学说, 可以从理论上保护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 同时



也能安抚一般下层民众，让他们相信今生的苦难处境，完全是前世的因果所造成。

人人信仰“喇嘛教”以后，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争取“来世”的美好幸福，容易有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忍受苦难的释怀，而贵族们的今生富贵，则是前世修行以及天赐的因缘，平民不可以强争。所以，“喇嘛教”就在蒙古地区开展扩大。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任何宗教，都是如此，不得不让人佩服阿育王首先发现的智慧远见。

清人方拱干在《绝域纪略》中提到：「满人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习而合掌以拱立矣。」满族女真人原崇奉“萨满教”，有清一代信佛，始自天聪十年（西元 1636 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之崇德元年以后。皇太极为笼络察哈尔蒙古汗之归服，于崇德元年在盛京沈阳修建了实胜寺，相继又修建了永光、广慈、法轮、延寿四座塔寺。

自元、明、清三代，帝王深知“因其俗而柔其人”、“化愚俗而弥边患”，则“西陲宴然”，便积极鼓励蒙古宗教的活动。清高宗乾隆在御制《喇嘛说》提到：「本朝之维护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来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因此进行“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的宗教政策。务使造成“然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训蒙古，中国之计也。”

清嘉庆时，被削爵的礼亲王昭槤也说：「国家宠幸黄教，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从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离。」可见清朝是利用“喇嘛教”稳定蒙古局势，以统治蒙古人民。因此，蒙古可汗的威仪，便随着诵经声和梵呗的飘渺而俱去，蒙古尚武的精神也因为脱下战袍换上袈裟，战鼓声换成手鼓声，都在蒙人成为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而消失了。

## ○“末世期盼”的真实性与背后黑手

由于传说下一尊佛弥勒不可能那么早降世，释迦佛圆寂自今，也只能有「东土小释迦」、「活佛」、「法王」等接近佛的形容辞，来称赞、尊重程度高的大师们。也就是信徒现世只堪称追求“法身成就”，如禅师；或“中阴成就”，如宗喀巴大士而已。不敢说是有“佛再转世”，连唐太宗贞观年间垂迹的寒山（文殊）、拾得（普贤）、丰干（弥陀）化身的故事，也只能说是「游戏人间」的显化罢了。

弥勒之名得自梅怛利耶（Maitreya、Metteya），是厚意、友情、慈悲（Maitri）之意，松本文三郎认为梅怛利亚是从吠陀神话中的蜜特拉（Mitra 太阳神之名）转化而来的看法比较牵强，取弥勒这一名称肯定是具有慈悲之心甚笃，能救济一切众生，这是不会错的。

虽然，显教强调未来佛弥勒菩萨从兜率天（Tushita，欢喜、满意之意）下降成佛，应该是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但是历朝、历代有佛教徒的中外国度，信徒们都在期望弥勒佛的即早来临，希望漫长的下一劫的时间，能够缩短或是期望经典说错了。

于是，武则天就演出自己是「弥勒降世」的神话，也创造新的中文字“曷”作为名，以便创出一片天空。而早在贵霜「政教合一」的时代，及至西域、中土，有很多帝王不是被僧侣推崇，就是自封为「当今如来」。如清代以乾隆为「现世佛」，随顺西藏以达赖喇嘛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说法，造成“现世佛”领导“现世菩萨”的事实，以便形成有清一代掌有西藏之宗主权；到了清末「君权神授」的美梦仍然存在，慈禧也喜欢被赞颂为「老佛爷」，都打破了“未来佛”降世的认知。

## ○冒充上帝的野心

人类的宗教不仅只是信仰而已，还都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可是，假借神的旨意来达成控制信徒是宗教的恶化。宗教如果成为混乱的世象、腐蚀人心的罪魁，则祸害更大。古来许多教宗、教士私心自用，假借上帝旨意欺瞒无知教徒；中国古今许多邪教教主（利用）宣称“弥勒降世”、代天宣化以图谋政权，都是操控愚民的高手，也是南北朝之后，与仿贵霜“佛教政治”在中国生根、发展另结的一果。

当长期战乱或社会衰微时，人们很容易流行“末法观”，并渴求或期待“弥赛亚”（新的救世主 Messiah）、“弥勒”（Maitreya、Metteya、Metrak，新的救世佛）的赶快降临，以等待变革、变天。各教的僧侣们对「末世来临」的鼓吹，已经说了好几千年，几乎是年年说。如果不说现在是“末世”或“末法”，信徒是不会马上来信仰的。

中古时代，在日本有一本假托是最澄写的《末法灯明记》，给后人带来很坏的影响，为了迎接末法时代的来临，日本的佛教界曾经以为反正已经无法时空倒退了，就拿不守戒律、不修行的现况去附合“末法”，很自然的为自己辩护，还特别强调即使是徒有虚名和形象的僧侣，信众还是要尊敬他们。这种不知长进的思想，竟然还曾出现在台湾，简直令人摇头叹息。

可是，「无知」就是恐惧的靠山，知识智慧不足的人被教导后，最容易接受群众效应而带入迷信中，便造成动乱或所谓的革命。而这些领军叛变、作乱的人，似乎认为自己的起义就是替救世主铺路，或者宣称自己就是救世主降世。这也是不论在哪个国家，“此方净土”的弥勒信仰总是首先兴起的，之后就被政府压制、禁止，随着“他方净土”的阿弥陀信仰才出现、兴盛，最终是阿弥陀净土的信仰力量胜过、取代弥勒净土信仰的原因。

几世纪前大自然的灾变，还被（因教士的大声疾呼而让）西洋人视为「上帝的惩罚」，就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以及吞灭的火焰，向你讨罪。」早期毁灭性的地震后，都认为是愤怒的神在处罚人类，心存恐惧的生还者，必会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急着要听教士或僧侣的预言，尤其灾后的余震，更会加强了僧侣威胁言辞的力量，总让信徒们恐惧不已。

一直到十八世纪有了地震的研究，才摆脱宗教神话和迷信，而建立了科学的地位。因

此，可知有很多无知的传教士或僧侣都会趁着灾变后，大肆推销「罪与罚」的预言和迷信，希望拥有更庞大、更听话的群众，古今中外比比皆然。

而且自古以来，外国传教士就扮演着间谍的双重身分，传教士很有耐性地深入邻国荒郊野地传教，同时对兽径小道都会描绘得十分清楚，经汇集后当然会成为进攻该国的最佳军事资料。亚历山大进攻邻国前，一定会派人去宣导各种预言、图谶，以便造成天意后，然后顺利征服该国。中国古代人民也先被教育成有相同的认知后，随后便很容易地改朝换代。

莎士比亚说：「无知是上帝的诅咒，知识是飞上天堂的双翼。」自古以来，宗教家也常以恐吓、压制、命令、统制的手段控制信徒，更可怕的是集体操控，而且已历经五千年以上。耶稣拜访的全部历史事件中，最不幸的乃是因掌控权力的人造成的。基督的话被转化或诠释似乎是贬抑和撕裂人的灵魂与意旨，以便奴役之。

本来神把西方人从充满种种恐惧、种种束缚的信仰与信物的重负中释放出来。可是人们（教会，特别是某些教士）的无知、偏狭戴上宗教神圣的桂冠，却变得固执、狂热，反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尤其宗教宣传让人相信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想赎罪的愿望就会越积极，因此就会产生一批批狂热的信众，这却又是僧侣们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物理学家大卫·波姆说：「人对于宇宙做了一番洞察与领悟后，将主宰万物的智能予以人格化，并称为上帝。」这种精神、这种集体的电磁心智，是所有个人心灵共同创造出来的实际能量，一种被爱激动的情绪就是“圣灵”，就是“上帝”。「是心成魔」、「是心成佛」只在一念之间，能不慎吗？

### ○佛教的庞大吸纳力

有谓作为佛教始祖的释迦牟尼，系源自伊朗太阳族的（日种的）释迦族，且叙利亚（Syria）与波斯（Persian，今之伊朗）也曾入侵并统治过印度，故也引起后来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因回纥人信仰而称之为“回教”，目前约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信仰）源头之关系的质疑。

但若然，则“婆罗门教”与后来的“基督教”、“回教”如何会影响了佛教，或佛教影响了“婆罗门教”或“基督教”、“回教”，其原因、过程、目的与影响，也尚有待由“婆罗门教”、“基督教”、“回教”与佛教经典对照比较，及由其历史与教史，加以考证。

如佛教密宗让佛陀有了婆罗门神祇的本领，许多“婆罗门教”的神祇也变成了佛教的护法和部下。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内容而更加丰富，将雷神因陀罗（Indra，佛教作为帝释天）、天神室鞞陀或伽蒂佉神（Skanda 或 Katikeya，佛教作为韦陀天）、智慧神莎罗室伐底（Sarasvati，佛教作为妙音佛母或大辩才天）（Laskmi，佛教作为多闻天）、管阴间的阎罗王（Yamaraksa，佛教作为大威德金刚化身），西藏密宗也吸收了土著“本教”的神祇当作护法，而庞大了“藏密”系统。

由于各种佛经原型或雏型，佛教法会、集会，及教派原型或雏型，都在佛陀入灭或印度教兴起百年或数百年后才形成的各种事实，也令人怀疑，后来“大乘佛教”部分经典庞大到极可能也与“印度教”息息相关，或是历代后人在不同阶段，假藉释迦牟尼之名，融合引用“婆罗门教”(Brahmanism)、“琐罗亚斯德教”(波斯袄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耆那教”(Jainism)、“希腊教”、“印度教”(Hinduism，目前信仰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 14%左右)、“波斯教”、“犹太教”(Judaism 目前信仰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 2.5%左右)、“基督教”、“诺斯替教”(Gnosticism)、“摩尼教”(Manichaeism)、“伊斯兰教”，及历代各教各宗派创作者的理念与思维模式，后人有意或无意口述、杜撰、编造或错误转述的，但均冠以「如是我闻」。

源自波斯东部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事火教)视水、火、土为神圣的，故反对水葬、火葬、土葬，而实行天葬或鸟葬，是否影响(传布)了成为今天西藏的「天葬习俗」。

有一说，传说中的西藏具〈大圆满法〉传承，古象雄“本教”祖师辛饶米沃以来自波斯，为古波斯达瑟族的文化，创造了“雍仲本教”。此系源自亚历山大东征，造成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逃难，进入象雄地区。又，于尼连禅河边皈依佛陀的优罗毗罗迦叶(Uruvelakassapa)、屠提迦叶(Nadikassapa)、伽耶迦叶(Gayakassapa)三兄弟，在未皈依佛以前所信的“事火教”，是否源自“琐罗亚斯德教——袄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人类发明了宗教，宗教需要僧侣和巫师。」虽然，宗教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避难所，让人们有了回避内在冲突的需求，但是神学家所鼓吹的「上帝」，实际上是对自然的秩序和运动的未知原因作神秘主义解释的结果。近百年来科学的证据更使得很多基督徒发现是「人创造了神——上帝」、「上帝需要基督徒」以后，基于众生皆有能觉悟之本性，不应再以宗教不同之分别，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很显然的二千多年前，许多宗教家就有这种认知，早已有所往来。

## ○莲花净土与埃及阿蒙神

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中国东方五大文明古国，所产生的哲学及宗教思想、神话等互相融合的情形，实应加以考证。(护教心重的人，一定喜欢听：原来是伟大的佛法影响了以上其他各教或文明。)譬如古埃及是世界上最早有莲花诞生的雕刻及绘画作品，有夜眠习性的莲花，让古代的埃及人相信，莲花的开放是和太阳的出没有关，被认为是“再生”的代表，更成为太阳的象征，以及太阳神「阿蒙拉」(Amon-Ra)的灵魂，莲花也被使用为往生天堂的供奉物。

近年来考古学家认为本次文明的人类源自非洲。埃及古王国是崇拜莲花的国度，莲花纹饰在埃及流行了三千多年，经西亚流行于印度次大陆和亚洲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莲花纹饰被利用在佛教寺院更特别的丰富，在桑奇石窟是写实的造形，五世纪时的“秣菟

罗艺术”则成熟地转化成图案式样。「净土思想」形成后，佛的金刚座也转化成莲华座。佛教的菩萨产生以后，吸收了印度女神信仰的特质，也是各个手执圣莲。

相信研究比较世界上古老的宗教，可以发现其相互间的抄袭引用。如“婆罗门教”的“湿婆”（Siva）神性复杂，称号极多，据传有一千又八个异名，在埃及则被称为“悉法”，在印度尊号为「大自在天」，在佛教认为是“一切魔之王”。而埃及的光头祭师制度，似乎也影响了佛教，但如今要追寻起来，必须耗费很大的心力。

### ○古代雅利安人并不崇拜偶像

本来印度古代的雅利安人（Aryan）并不崇拜偶像的。而且佛陀当时扬弃五颜六色的衣着，不穿金戴银，佛陀告诉世人这些俗物只会招惹人心的潜在欲望罢了。尤其原始佛教是禁止制作佛陀形像的，至于优填王造像的「传说」，应该是在佛像制作盛行以后的时代所编写的。

而偶像崇拜对于原始佛教这种十分精致、带有纯哲学思辨的特殊宗教，按理是格格不入的。一定是受到某种相当程度的外来影响，才会如此，应该是希腊裔的佛教徒从埃及学到的。原始佛教本来是大力摒弃偶像的崇拜，但后来偏偏是它，发展到最后，表现得最为充分，远超过了其它宗教，以至于被穆斯林们直呼为“偶像教”，这的确十分耐人寻味。

那么现在的「印度教」为何也是一个精致的偶像教？其实「印度教」只是后期之秀。自从佛陀被「印度教」收编认为是他们主神的第九个化身以后，印度当时的宗教已完全变成偶像崇拜的信仰，而且还更青出于蓝。其演变的过程，在上世纪由考古历史资料中，已经显示非常清楚了。

从电视节目「大陆寻奇」介绍大昭寺时，就有通汉语的喇嘛滔滔不绝的说目前所供奉的主尊，由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佛陀十二岁等身像，是早在佛陀说法时所刻成的，并且佛陀还亲自「开光、加持」过，就不必信以为事实。但是类似的情形，经过大师虔诚的表现，信徒便会以为真，尤其随便一颗所谓的「活佛」认证的佛牙，也曾让台湾带来一股「圣物崇拜」的热潮，就可想而知了。

### ○偶像崇拜附加了崇拜帝王的方便

佛陀涅槃后，佛教势力与日俱增，僧团便将佛法理念具体化，以便维持僧团的存续，更让信众有一套遵循的法则。当然类似“婆罗门教”的传说方式，关于佛陀的前世故事也开始流传，绘画和雕刻艺术，也开始以佛陀为创造的主体。或许后世的信众必须树立一个权威，或树立一个精神象征，佛法「宗教」成立之后，智慧的内在因素从此就变成表面化至今。

后来，对佛陀的记忆逐渐消失，造成信徒长期思念的苦闷。当希腊文化随亚历山大大

帝进入西北印以后，为了迎合信徒的渴望，于是宗教家便开始模仿希腊的习俗制作了佛像，如此总比凭空苦思观想好多了。于是后来在「贵霜王朝」所属的犍陀罗地区开展的佛教艺术，也从“无佛像”进入“有佛像”的历史转变，也就是从“正法”落入“像法”的开始。

因为塑造了佛像因而产生崇拜偶像的信徒群，并伴随着宗教礼仪，而发展成为一种膜拜形式，佛教才开始变成为“偶像教”。本来佛像是追念、感怀的对象，在密宗也是模仿的对象，佛的坐姿，甚至菩萨的手印，都是有教学的作用。可惜大众却被教导成为崇拜偶像的求福者，信徒们从此不能感知心中佛性的存在，不再追求自我的证悟，配合帝王威权的崇拜，而相信外在的偶像才能救赎人类，这是史上最大的迷惑。也因为对宗教的愚诚，而导致无限的迷信。

建国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王朝」基于希腊人神同形、同性——「人神一体」的观念，以佛像取代佛塔，更把佛陀改成印度化的阿波罗（Apollo）的样子，有着波状的毛发，但却也只是泛希腊化地区的佛陀。后来逐渐文化融合，将希腊、波斯、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形成为贵霜帝国的佛教文化。

从此，佛法由内修的「正法」五百年，步入膜拜偶像的「像法」时期。可见凡是经典一再描述应对佛像如何如何，这些经典都可以判定那是佛陀圆寂五百年以后的「后造经」，纯属僧团特别结集后的产品，不是佛陀当时所说的法。

后来世界各国自行雕塑的佛像，也全然不同，此与非洲黑人基督徒就曾把圣母玛丽亚、耶稣塑造成黑皮肤的形像，以便让同胞认同，真是异曲同工。据说可能在八世纪时，古印度梵语学者阿斋布所著有的《九架手造像量度经》与《十架手造像量度经》，和《绘画量度经》一同被引进西藏，作为西藏雕刻艺术的标准。

中国则迟至清乾隆六年（西元 1741 年），为了汉地佛像的大量粗制滥造，清高宗乾隆便下令译出《佛说造像度量经》以统一佛、菩萨、佛母、明王的造形。（当然这些经是大德编造，非释迦佛亲说。西元 1992 年也有一本新编译的《藏传佛画度量经》，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 ○观世音菩萨的变身

但就造像本身来说，必会渗透进作者的主观性，雕塑者没有人见过佛陀，于是便以当时所谓各国的「转轮圣王」，或以各创寺住持的形貌来制作，因此就带来佛陀（觉悟）境界的矮小化和固定化的弊端。据说最早是因为迎合北魏灵太后的虔诚敬佛，而将观音变成女性。

后来，武则天深谋积虑想当皇帝，上位后即计画作佛教女转轮圣王，唐代的佛教造像活动，也开始将观音菩萨（应为观自在菩萨 Avalokitesvara，非是“应声”菩萨；Avalokita 阿缚庐积多义为“观，”svara 义为“声音”，而 isvara 伊湿伐罗义为“自在”，也是印度

教的自在天，ta 和 i 连音读成 te）、不空羼索观音等菩萨造成女相。有考据唐代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秀丽脸庞就是以武则天为蓝本刻划的(但是也有人说那是唐高宗的脸)。

### ○帝王面貌的佛像

早在北魏时期（西元 386-534 年）拓跋氏的帝王们不仅祈求佛要保佑“长治久安”，还把自己的面貌形象作为佛像的模样，站在石窟或寺庙的中央，接受人们的膜拜；四世纪时，缅甸的玛哈西那王听说巴米扬大佛的脸像与国王和王子很像，便下令依自己的脸庞在卡拉威拉西方的山区雕刻沙西鲁瓦大佛；高棉百戎寺（Bayon Temple）五十四座大大小小的宝塔，都堆砌有四面微笑的佛陀面孔，被称为「高棉的微笑」，这 216 张佛陀面孔其实都有阇耶跋摩七世的影子，用于代表至高无上的王权；泰国北方清迈市区的瑞洽曼卡路（Ratchamanka Road）有一座曼格莱寺，其至尊佛像也是以当时的曼格莱王的长相塑造的。

如此把追求于众生内心的佛性，沦落变为崇拜外在的佛像，这并不属于佛教的精神范畴。由于有意引导，造成信徒诚惶诚恐的迷信，加上人性的懦弱屈从，佛教便被帝王强加扭曲利用。但是，各国不同文化下所塑造的佛像，并不能使异国人民认识，而且会有陌生感。其实清净何来此像？尤其取相（像）则易颠倒迷惑。因此，如何引导信众对佛像的正确观念，应该是如何明确地转化成智慧的思维。

又，供花献佛正如同我们以花圈装饰在阵亡将士铜像前一样，是在感佩其崇高精神，同时营造庄严的气氛，而不是求那些金银物像的神秘加持。若说佛像必需享用烧香、供物，岂不把信徒吓死？而且佛菩萨真的会（需要）享用世间的供品吗？难道人间的供品会胜过天人的供品吗？法身佛还需要吗？

百丈·怀海禅师（720-814）童年之时，随母入寺礼佛，指佛尊像问其母：「此是何物？」母说：「此是佛。」即答说：「形容似人，不异于我，我后亦当作焉！」可知禅师幼时见佛像，并不是崇拜或是要求佛加持、降福，而是想能如佛一样成就。那么佛像是模仿学习的榜样，并且告诉人人皆可觉悟如佛，如此造佛像才有意义。

###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破坏圣像的经过

因为犹太人摩西的发现，首创了只敬仰一个上帝，一个超脱凡人形象的上帝，以及他的「道德宗教」。因此对上帝的信仰，不应该出现偶像的崇拜。对无形之神的祭祀，禁止一切祭品供物，禁止富丽堂皇的仪式，禁止那些用以满足耶和华所需的仪式，因为耶和华无所需求，这是当时信仰“耶和华教”的特色。教徒对“十诫”的立约，是以这些准则律己，以此来取代那些虚假奢侈和华而不实的祭仪。

尤其，《犹太法典》是彻底的圣像破坏者，旨在摧毁一切为上帝树立的形象。东方人认为梵天（即忉利天，又称三十三天）天主帝释桓因天帝在中国“道教”称为张玉皇，是“基督教”的耶和华上帝，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阿拉真主。那么，基、伊等教是反对圣

像崇拜的，可是为什么佛、道两家却是热烈崇拜偶像的？

但是，不管东方或西方，宗教与政治两条线一直连续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宗教传播者总是设法以上帝自居，总是设法强迫人们要通过他才能寻求神，所以，西方聪明的统治者就想方设法染指宗教。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西元 726 年），拜占廷（Byzantine Empire）利奥三世为夺取教会、修道院土地，减少修道士人数，颁布反对供奉圣像诏令。拜占廷历史上“破坏圣像运动”由此开始。

西元 755 年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e）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圣像崇拜，“破坏圣像运动”于是越演越烈。直至西元 787 年拜占廷摄政伊林娜皇后在尼西亚召开宗教会议，决定重新允许圣像崇拜。可见在之前基督徒亦是崇拜圣像的，为何会下令“破坏圣像运动”，又恢复崇拜圣像，其中必有缘故，值得深思。

而且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阿拉伯人也曾对精灵、星宿、偶像十分崇拜。公元六世纪的时候，有「真主的女儿」阿特、欧萨、默那的三位女神，深深受到以麦加为中心各部落人民的普遍崇拜与献祭。连造物主阿拉神，也是他们唯一在危难中呼求的神，只是未为祂雕刻成偶像而已。

其实，崇拜人形的偶像与非人形的图腾是相同的意思。“基督徒”所佩带的十字架、耶稣的塑像、圣母玛利亚像；“回教徒”的麦加圣城三大巨石柱、《古兰经》书；各国的国旗、军旗、党旗等等都是一种信物式的偶像产物。“伊斯兰教”所主张要消灭的是他教思想的信物，极度不允许、不容忍他教的存在，才有消灭偶像的借口。当然，这与禅宗提升宗教的思维以后，追求自力的过程，不再需要佛像的他力崇拜，其意义是不同的。

南宋光宗绍熙十一年（西元 1200 年，金承安五年），中亚回教民族大举南下，穆罕默德·巴哈帝瓦率领“伊斯兰教”教徒攻击虔信密宗的印度「巴拉王朝」（波罗，Pala），攻下那烂陀寺（Nalanda temple，意为施无厌寺），处死光头的出家众，烧毁珍藏书籍，借口要连根拔除偶像的崇拜，这又是代表着什么信息，值的佛教徒深思。

而“印度教”传统的祭师则属“婆罗门”（Brahman）阶层，都居住在农村，没有固定的集会场所；但“天竺佛教”则十分有组织，有正规的僧团，并且受到帝王的支持，建有大规模的寺院，最容易受到外来统治者瞩目，而加以摧毁，这是佛教在印度被灭掉的主要原因之一。

佛教在印度被灭的另外原因有二：其一是“天竺佛教”始终未能在广大的下层群众扎下根基，却专长于深奥的哲学思辩（辨），而丧失了民心；其二是后期的佛教为了生存，为了争取新的信徒，佛教必须有所让步，而向“印度教”妥协，丧失了佛教的特点，最后导致在印度彻底灭亡。（此外，佛陀圆寂一千年后，被印度人尊奉为毗湿奴神的第九个化身，也是最大的原因。）



因为原始佛教是“无神论”，佛教不主张苦行，不提倡生殖力崇拜，与印度人的生活并不妥协，“大乘佛教”也是如此坚持。现代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斯兰就说：「对于道德的笃信是佛教力量的秘密，但对于人性神秘方面的忽视是促使它失败的原因。」

### ○像不神圣因人而起

有很多附佛外道，利用重复曝光制造重迭显像，更笨拙的是被指头或其他景物挡到，洗出照片来却大肆宣传为放光加持、神佛降临，达到种种自我宣传的目的。而密教则是为了将深奥的密法，以各种特殊造像来「表征」、来模仿，然后再详细解说，并宣告要于「最终」而放弃，应离执而无执，显然是针对当时、当地人心、文明之不同而设计，真是用心良苦！可是现今的信徒却沉迷在庞大的佛像、护法神像上而不能自拔。

在中南半岛信仰“南传佛教”的各国，就曾为了一尊玉佛而争夺交仇，虽然目前供奉在泰国王宫，好像已经没事了，但是如果对于玉佛的拥有，还存着丝毫的恨意，未来的争端仍旧难免。

### ○佛像或信众才需要殿堂

在西元一世纪形成的“大乘佛教”，就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让佛教进入「像法」以后，当然有了偶像崇拜。有了佛像就需要有遮雨避风的处所，所谓佛殿可以说是佛像的住处，平时佛教徒说“供佛”，就是供奉、侍候佛，让曾身为太子的佛，住在宫殿般的佛殿里，功能如同帝王平常的住家，与希腊神殿类似，希腊的庙宇就是神的家，所以都是面较宽而进深较短。基督教教堂则是讲道及僧俗一齐祷告的地方，和希腊神殿功能不同，因此基督教的教堂进深很长；佛教宝殿只是佛的住处，只有僧侣上供或早晚课时才使用。

其实，佛教并不需要佛殿，佛教需要的只是佛法和佛教徒们。佛法要有人来弘传，没有佛法的殿堂，就会沉寂、破败。有了正法才需要有信众聚会、闻法、修行之处，只要信众能够凝聚，佛殿就会逐渐改进，才会有了后代所说的佛教建筑。建筑规画如何融入佛法智慧？如何呈现佛教的哲学理念，主导与设计建造的人，都要有很深的佛学涵养。并不是像台湾近几十年来，先建好制式豪华的中国宫殿式殿堂，然后视信众的多寡，再急就章地到处违章建筑，显得唐突与不协调。

### ○布施的真义

本来所谓“布施”非舍财物、非舍血肉、非舍外物。乃是捐弃一切贪妄名色诸念，若此诸念不除，即是不能布施。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者，于如来所说甚深经典，受持读诵者是，余诸供养不可等伦。如今各方长老皆说布施，其教法的弘传只重于建筑在深山里冰冷的硬体，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却非常需要智慧的指引，但都被忽视了。而且未来佛教建筑是否可以摆脱古老帝王封建时代的建筑式样，是需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才能扭转，而这更需要靠大师们的大智慧了。

滥设佛事出于藉用（以为可以）「福国利民」之祈祷精神，历史上多少妖僧，上诬君臣，下诳愚民，或阴谋篡位，导致亡国残民，在佛教各国常见，但这种情形并不仅限于佛教，二十世纪以前的各种宗教，都有类似败坏宗教的妖人存在。就有曾是〈佛教慈济功德会〉的大护法，这几年才改信“基督教”的一位李建筑师说出：「凡是迷信佛教的国家、社会，都会被供养、奉献三宝与大兴佛寺，搞得民疲国穷。」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大师或大德们应该深思为何会（要）如此？而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反而如今都站在强盛的地位？

## ○庞大的消耗

东晋时，高僧道恒曾写当时部分寺僧：「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与俗人无殊。义净法师曾在《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到唐代寺院积聚财富的情形：「宁容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不知受用，共相抱贫。可否之宜，智者时镜。」一方面僧人在刻意追求生活上的舒适与安逸，也让很多俗人羡慕都想出家为僧，古今皆是如此。

惹出「三武一宗」之难，中土拥有灭佛恶名之一的名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将佛、道二教一起禁止，经典及造像悉行毁掉，强迫数以百万的僧众还俗，让多数强壮的沙门应征从军，为的是求「富国强兵」的政策，以便攻伐北齐。建德六年（西元 577 年），攻占北齐邺城，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令」，史载“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

萧梁时，郭祖深之〈舆棹诣阙上封事〉写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这种情形让士大夫对佛教产生极大的反感。

另一位灭佛者是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西元 845 年）下诏曰：「……乎九洲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为土木之功，夺人力为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似宫殿。……」

以上三者均起因于佛教“侵夺民田，开园百亩，倾竭府藏，充佛福田”过度迷信而惹祸，部分僧众贪求名闻利养，造成明智的帝王与信众的反感，这是值得今日佛教徒检讨的事实。

高丽之一然禅师论“新罗末期佛教之弊”说：「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致使闾里比（羨）其塔庙，齐民逃于淄褐（僧衣之色）。兵农寝小，而国家日衰，几何不乱（而）且亡也哉？」佛教本以清净寡欲、离世绝俗为宗，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过度迷信以为可以富国强兵，实属妄想。在中国如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特别佞佛，遇“侯景之

乱”时，仅能躲起来诵经，以为会有神迹出现，后来竟然饿死于同泰寺。

日本神护景云三年（西元 769 年，唐代宗大历四年），有太宰府执掌祭祀的神官习宜阿曾麻吕为了讨好「太政大臣」禅师道镜，便假托宇佐八幡大神（原为谷神和铜神）的神谕，称「道镜即位，天下太平」。道镜居然高兴得想当天皇，后被发觉阴谋而失势，被贬到下野（今栃木县）任药师寺别当（同座主），两年后去世。

### ○现代禅宗对盖雄伟佛寺的说法

中国人对佛教的神力比较关心，认为佛殿越大，则神力越大，信众已经不重视智慧的传承。如今台湾的佛教学到中国佛教的就是表象的大部分，才产生目前不可思议的迷信。西元 2001 年，台湾中部有一座标榜宏扬「禅宗」的现代化、电气化佛寺落成，居然自己宣称：「因为和尚的德性高，所以寺庙要建得高；因为和尚度众的心愿广，所以寺庙便盖得大。」呜呼！佛法的认知已如“水老鹤”般，简直惨不忍睹。

但是，无论基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奉献，或是“大乘佛教”的无量布施，都没有转化成生产投资，信徒的血汗不断的沉淀在寺庙之中，也带来惊人膨胀的寺院负担。为的是什么？是成为一宗之主？开山祖师？建寺的劳累往往让老和尚的精进停顿，甚至积劳成疾而亡。尤其自古至今都让中外各国的国力无休止的消耗，如此造成国疲民穷，最后都会埋下亡国的伏笔，怎不教人深深警惕。

### ○应该及早停止宗教的剥削

自古以来僧团都教育信徒要无条件的信从僧人，不能怀疑或是批判僧人，一千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借用著作《数位易经》的陈文德居士在书中提到他的印度籍老师曾谆谆告诫说：「出家人最重要的是要随时警觉自己是被供养的剥削分子，缺乏这份警觉，而自认是无上的功德，这不但是剥削自己，更是在剥削别人。」如果宗教人士缺乏这份警觉，佛寺势必成为剥削信徒的赚钱机器，而不是宏扬正法的道场了。

元代有人批评说：「国家财富，半入西番。」张养浩在《时政书》提到：「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本书介绍各国佛教建筑的同时，发现对于只求大兴佛寺、佛塔的情形，却没有教育信众智慧，导致的祸果甚多。中南半岛信仰“小乘佛教”的国家如缅甸，以及“藏传佛教”的地区，也依然迷信、依然贫穷如洗，这些情形应该使台湾的佛教界作为借鉴，即早觉省（醒）以免经济、国力沦落。

由于亚洲西元 199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促使管理约三十万僧侣的「泰国僧侣最高理事會」下令：「各寺庙不得再兴建任何新寺庙，正动工者也必须停工。」泰国一名宗教事务部官员说：「寺庙建庙一定得向民众募捐，而民众已因经济风暴吃尽苦头。」该理事会建议僧侣可将心力多用在社区服务的工作上。并禁止在国外的泰僧托钵乞钱。但是台湾的佛教会并没有如此的体恤信徒，不敢对各山头的大老们作相同的呼吁，依旧让大师们宣传盖寺

庙的功德，准备继续挥霍。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 ○小结

宗教随着政治的需要，随着信徒的渴望，一路来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于古代的纯真。从上面的资料看来，古是今已非，或者复杂化了。我们好渴望了解什么才是宗教的纯真精神，好用来解救人性，而不是靠华丽的建筑物来满足感官，自以为那样才能够贡献出对宗教的虔诚。

几十年来台湾盖了太多的寺庙，照理讲人心应该会随着宗教的发达而有所改善，很可惜的并非如此。若寺庙仅是一处供信徒膜拜（cult）的屋宇，信众只是短暂性的膜拜团体（cults）而已，佛法智慧则无法深植人心。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个良知，如果不坚守道德规律，只追求富丽堂皇的殿堂，终究只是一种“假象”。尤其我们可以确认佛教建筑的兴旺，并不代表佛法也是兴旺的，可是「庙在，法不在」，因为那只是一种“假象”，应该适可而止，奉劝大师们不要再继续挥霍了。

在二十世纪结束了，经济的不景气又持续影响着二十一世纪之初，就要深思宗教最重要的指标应该培养智慧教育才是。初期大兴佛寺是沿自帝王及官方教化的手段，但是修学佛法首先不必要兴建豪华的殿宇，信徒最需要的是“正法”的教导，而不是藉名宏扬“人间佛教”，专注佛教经济，推行慈善救济志业。应该先把佛法的智慧深植人心，景气恢复时，自然信徒会感恩而修建佛寺。

如果仅继续玩弄“像法”的把戏，“末法”镀金的佛教迟早会被信徒疏远，而导致衰败。连续多年的不景气，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钱继续布施，造成信徒一直在躲避师父们，志业设定太大的大师们，开始充满着下午三点半追钱的苦恼，这是一个警惕。因此，在佛教汉传或南传的国度，比较明智的帝王都曾经遏止滥建佛寺，要求先能弘扬“正法”，才能维持佛法的命脉。读者大德们，您说呢？